

准印证号：(53)Y000012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曲靖社会科学

2

2021

(总第145期)

Q U J I N G S H E H U I K E X U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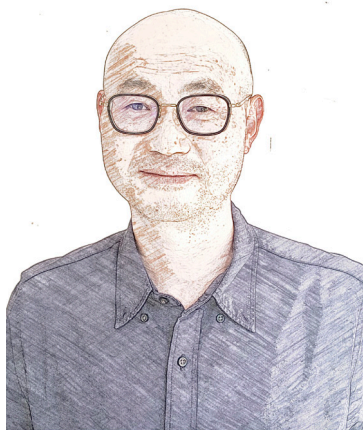


主 办 云南省曲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云南省曲靖市社会科学院



曲靖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者，获奖作品：《减税降费背景下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基于富源县煤炭依赖型财源培植涵养的视角》（论文二等奖）

张建波，男，汉族，1979年6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财税经济师，文化馆员，曲靖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富源县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富源县财政局。主要从事基层财政治理、财税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研究，先后在国家、省、市、县发表论文、新闻、信息、散文、诗歌、摄影等作品1000余篇（幅）80余万字。在《财政科学》《云南财政》《曲靖社会科学》《珠江源经济》《曲靖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论文30多篇，《资源依赖型县级财政改革发展的对策思考——基于云南富源县财政运行改革的视角》刊于国家财经类核心期刊《财政科学》2018年第12期，《强化财政改革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以云南省富源县为例》荣获2018年《云南财政》“研究奖”等，作品获奖20余次，荣获“云南省2017年度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管工作先进个人”、《云南财政》十佳通讯员等荣誉20多次。



曲靖市第五次、七次、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者，获奖作品：《基于文献学的滇剧传统剧目来源与分类研究》（论文三等奖），《文物视野下云南清代戏曲演出述论》（论文三等奖），《守望中的行进 云南戏曲与花灯演出组织研究》（著作三等奖）

吕维洪，男，1970年4月生，云南省沾益区人。文学硕士，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持完成云南省哲学艺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项、主持云南省哲学艺术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一项、主持教育部哲学艺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项，荣获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次。在《四川戏剧》《兰台世界》《思想战线》《电影文学》《教育文化论坛》《民族论坛》《牡丹江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云南戏曲与花灯演出组织研究》。

紧盯新目标新定位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胡向华

在全市上下以饱满热情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关键时刻，4月8日，省委、省政府曲靖现场办公会召开，为曲靖发展把脉定向、谋篇布局。会议强调，曲靖市要明确目标定位，找准科学路径，形成加快发展的共识，上下一心、团结奋斗，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云南副中心城市和滇中城市群重要增长极。

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会充分肯定了曲靖“十三五”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十三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市内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1738.22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959.35亿元、年均增长8.8%，分别快于全国、全省增速3.1和1.0个百分点。2019年进入全国地级城市100强第86位，2020年成功进入全国百强城市行列，在全国城市GDP百强中排名第94位，较2019年前进11位，实现了高质量跨越展新。世界一流“三张牌”打造成效明显，绿色硅、绿色铝、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发展实现新突破，煤炭、焦化、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焕发新机，种植业结构调整、畜牧业转型升级、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省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在全省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会议深入分析了差距短板，科学确定了曲靖的发展目标、发展定位，明确了发展路径，提出了工作要求，为新时代曲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进入新阶段，曲靖将把握新目标新定位，本着“奋发有为、跨越发展、放眼全国比较、走在全省前列”的精神，凝心聚力加油干，紧扣成为先进制造基地、高端食品基地、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云南副中心城市新定位，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实现未来15年GDP年均增长9%以上，力争2025年经济总量迈上5000亿大关，争取2025年进入全国地级城市65强，努力把曲靖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云南副中心城市。

省委、省政府对曲靖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曲靖怎么办？本期以党史学习教育为背景，特别推出党史学习教育专栏，通过深入挖掘全市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激励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讲好曲靖红色故事，赓续奋斗史诗，鼓舞全市各族人民戮力同心、迎难而上、奋斗不止，主动担当作为，以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劲头推动曲靖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实现新的跨越、走向新的高度，向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优秀答卷。

曲靖社会科学

主 办 云南省曲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云南省曲靖市社会科学院

顾 问 唐开荣 杨蔚玲
主 编 岳石林

副 主 编 王小祥 李虹霞 阎云华
编 委 朱 升 唐 玲 范全军
臧国书

编 辑 汪德勇 高 皓 陈小琴
董 立 张 兵
实习编辑 邱俊翔 韩 瑞
陈诗珏

编辑部电话：0874-3365168

编辑部传真：0874-3190268

来信与投稿：qjshkx@126.com

曲靖社科网：www.qjskl.cn

地 址 云南省曲靖市文昌街67号曲靖
宾馆三号楼2楼

邮 编 655000

印装：曲靖飞越彩印有限公司

电话：0874-3219735

印数：2300册

2021年第二期（双月刊·总第145期） 出版日期：2021年4月

► 卷首语

1 紧盯新目标新定位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胡向华

► 党史研究

4 百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方 涛

8 传承“红色基因” 奋进曲靖新时代

/岳石林

13 自我革新 负重前行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梁峻豪

20 陆良暴动：打响滇东武装革命第一枪

/张建刚

25 罗平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考析

/杨丽萍

28 兴修水利惠民生 陆良旧貌换新颜

/杨 辅

► 理论研究

31 发扬“三牛”精神 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段惠萍

33 牢牢抓住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导思想

/蒋云川

36 谋划曲靖市“十四五”服务业发展新篇章

/刘 颖

CONTENTS 目录

- 40 以绿色能源牌为引领 构建现代化光伏产业体系
/陈小琴 胡向华
- 43 供销合作社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共曲靖市委党校课题组
- 46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思考
/陈玉森
- 49 升级换代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选择的核心要件
——以宣威市普立乡为分析对象
/高满良
- 53 繁荣发展民族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曲靖市民族文化工作调研组

▶ 法治建设

- 57 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的实践与探索
——以曲靖市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为例
/杨洪春
- 64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保障全面实现小康
/许 霁 张 伦

▶ 滇东古今

- 69 马龙汉族溯源
/杨增外

封二：专家风采

封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稿启事

百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 方 涛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领导人民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探索形成了符合国情的中国道路，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化理论创新、理论武装、理论强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勇于自我革命，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标准贯彻到党的各项建设中

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牢坚守自己的政治方向、政治信仰、政治纲领、政治道路和政治原则，发挥政治的指南针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彻到党的各项建设中，保持了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以此推动党的其他各项建设。

制定并实施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前提。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道路，取得革命的胜利，党的建设也获得了

极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实行同步推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开放后，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党带领人民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必须充分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地位，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忽视政治、偏离党的政治方向等突出问题，100多次提到政治，以加强军队中党的政治建设。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把政治上巩固确立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批评单纯从组织上建党而忽视政治上建党的错误偏向，强调毛泽东正确的建党路线是首先着重在“政治上进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明确提出政治是统帅、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必须做到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干部要

作者简介：方涛，政治学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兼任广东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又红又专，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同时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命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正式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将其作为党的各项建设之首，并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政治上的加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以密切联系群众为重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力量。百年来党的历史一再证明，什么时候群众路线贯彻得好，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

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明确提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战争的伟力在人民，要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赢得群众的支持，还通过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整风运动，防止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发生，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于1951年开展“三反”运动，1957年开展了整风运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强调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意义。1961年，党中央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1962年，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重申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批评了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推动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巩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作风，把党风问题上升到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危急时刻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并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特别是在改进作风上，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使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党群关系明显改善。

三、以党的思想建设为基础，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理论强党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和大众化，着力从思想上建党，坚持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不断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推进理论武装、理论强党，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革命战争年代，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就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延安时期，党中央专门设立干部教育部，还通过创办中央党校、马克思列宁学院等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开展学习运动，成立学习组，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改革开放后，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党委中心组学

习，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完善“三会一课”，先后开展“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及时跟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深入推进制度治党

加强党的建设，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必须把党的建设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制度建设贯彻到各项建设之中，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转化为具体的、科学的、可操作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党的各项建设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始终能够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实现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革命战争年代，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就制定了党史上第一部党章，对党员、党的组织、会议等作出规定，还专门设置“纪律”一章，以保证党章的执行。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四个服从”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为此，全会分别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部的工作规则与纪律。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制定了报告制度、党委制，对请示报告制度、党委制作出具体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全国执政条件下制度的重要性。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就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4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需要建

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然而，由于没有解决好制度问题，党的建设出现过重大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建设好的传统“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靠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新时期党章的修改和完善，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另外，还制定了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等，建构起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把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内容，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一体推进制度改革、制定和执行。

五、勇于自我革命，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

实践表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各个历史阶段，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方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以正视问题、动真碰硬、敢于交锋的勇气和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

延安时期，毛泽东创立了整风运动这一方式，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思想上深刻反省、对照检查，进而树立正确的思想和作风，成功实现了党的自我净化。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党性修养，提升党员干部素养，实现党的自我革新。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执掌全国政权，官僚主义作风开始滋生，有的干部经不起权力的考验，还出现了贪污腐

败。在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整风整党运动、“三反”运动等，集中高效地克服了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克服党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上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干部老化、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反对领导干部待遇特殊化。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新的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召开的十五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作了题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讲话。

新世纪以来，从严治党方针不断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社科

责任编辑：陈诗珏

传承“红色基因” 奋进曲靖新时代

■ 岳石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既要认真读全国党史这部大书，也要好好读地方党史这部生动的教科书，从地方党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一、得思想之先，播红色火种

曲靖自古为入滇门户，素有“云南咽喉”“滇黔锁钥”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我党较早播撒革命火种的热土。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上，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形成了流淌在滇东大地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曲靖人奋勇争先、追赶超越。

（一）党的早期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曲靖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于寻求先进思想指导、探索救国救民的行列之中。1918年，在日本的曲靖籍留日学生就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军方先后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共同反对苏俄的《中日军事密约》的斗争。回国后，他们又在昆明建立云南救国团，发动全省人民起来参加拒绝与日本签约的斗争，并号召开展抵制日货的行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大批包括曲靖在昆

明和省立第三师范读书的学生，走上街头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由省议会、省总商会、省农会、救国会等机关、团体发起和组织，召开了有近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成立了云南学生爱国会，在云南各地包括曲靖成立分会，纷纷发表宣言，抵制日货，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洗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曲靖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曲靖传播开来。一批进步青年抱着追求知识、追求进步、改造社会的理想，到内地或出国追求真理。他们有的进入昆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学习，有的漂洋过海出国留学或勤工俭学；另外一些人则在省内组织革命团体，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中一部分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引导和帮助下，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在不同地区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周建屏、桂涛声、金耀曾、戴德明、浦承绪、伏瑞贞、刘雄武等，成为早期曲靖籍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为中共曲靖地方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7年至1930年，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会泽、曲靖（今麒麟区）、陆良、宣威、马龙等县和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先后建立党的支部、特别支部乃至中心县委，在会泽组建“云南救

作者简介：岳石林，曲靖市社科联（院）党组书记、主席（院长）。

贫义勇军第一师”，在陆良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暂编第38军”，组织发动了陆良、会泽武装暴动和学潮运动，使曲靖成为云南早期中共活动的重要区域，为党领导的曲靖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撒播了革命火种。

（二）红军长征过曲靖

1935年和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即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两次经过曲靖，途经富源、沾益、宣威、曲靖、马龙、会泽等县，停留及过境时间总计约30天，行程2000余华里。

中国工农红军在曲靖境内与敌人先后进行了富源白龙山、车心口和沾益白水、曲靖关下村以及宣威虎头山等大小战斗数十次，先后包围佯攻沾益、曲靖县城，攻克马龙、宣威、会泽县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富源营上发布《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在曲靖西山三元宫召开重要会议，作出抢渡金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形成《关于我军抢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等电文。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曲靖这块红土地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红军长征在曲靖的日日夜夜里，除英勇作战，攻城夺地，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外，所到之处还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纪律严明，全区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先后达2000余人。红军长征两过曲靖，用鲜血在曲靖大地书写了红色记忆，进一步撒播了革命火种，为中共曲靖地方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二、顺革命之势，干革命大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曲靖虽地处西南边陲，但是，曲靖人民始终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能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顺应国家大势，做惊天动地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出曲靖人民应有的贡献。

（一）抗日救亡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局面的逐步形成，在1935年11月恢复重建的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曲靖各级地下组织得以恢复重建，党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开展。1936年至1945年，上级党组织先后增派一大批党员骨干到罗平、沾益、宣威等县加强领导和开展工作，在罗平建立县委，在沾益建立特别支部，在宣威、陆良等县建立支部、党小组和若干秘密工作据点。曲靖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曲靖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曲靖作为西南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地区之一，在外敌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民族危亡处于最关键时刻，曲靖各族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号召，不仅在区内修建公路、铁路、飞机场、输油管等大批军事设施，曲靖各族人民还积极参军参战、参加修建滇缅公路、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并承担十分繁重的各种赋税劳役，曲靖本土也多次遭到日军机轰炸，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支援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与贡献。

曲靖地区各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据《曲靖地区志》记载，1939年，曲靖地区所属曲靖、马龙、宣威、会泽、陆良、师宗、罗平、富源、沾益各县总人口为123.4万余人，1937年至1945年，曲靖地区征兵人数至少在6.5万人。加上抗战前应征入伍和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的人员，曲靖地区为抗日战争输送了至少7万名的兵员。他们被分别编入八路军、新四军、六十军、五十八军等部，先后参加台儿庄血战、长沙会战、武汉保卫战、百团大战、滇西抗战、远征军入缅作战等，其中众多指战员战死疆场。曲靖籍参加全国抗战，并为抗战胜利作出英勇牺牲和积极贡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周建屏、徐文

烈、桂涛声、徐文礼、周时英、宁坚、赵浦民和浦氏三姐妹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卓琳）及王甲本等人。据不完全的历史档案资料记载，曲靖籍在抗战中阵亡人数应不少于1.55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曲靖籍抗战阵亡将士就有3000余名。英勇的曲靖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边纵革命

1947年6月6日，根据云南省工委指示，在滇黔边界的宣威宝山、格宜一带建立了党领导的秘密武装“六六分队”；7月，陆良地下党支持统战人士杨体元与陆良反动当局进行武装对抗；10月，地下党组织发动罗平钟山乡400余武装同罗平县国民党常备队对抗，反蒋武装斗争在曲靖拉开序幕。1948年，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宣威宝山、格宜，会泽火红、尖山，沾益播乐中学等反蒋武装起义，使反蒋武装斗争在曲靖蓬勃发展起来。尽管起义队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围剿镇压下，有的失败或遭受挫折，但起义成功和坚持下来的均先后编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成为党领导的云南反蒋游击武装主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主力离滇赴越南河阳整训期间，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与留下的自救军第三支队密切配合，在敌强我弱的艰险环境中，不仅坚持了盘北斗争，还建立了较为巩固的陆良龙海山、罗平钟山、沾益播乐等游击根据地，为迎接主力回滇和反蒋武装斗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8年底至1949年9月，在云南省工委、桂滇边工委和滇桂黔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又先后成立了罗盘地委、滇东北地委、弥泸地委、昆沾线中心县委、滇北地委。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游击战争的烈火燃遍曲靖广大农村，建立起了连片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先后解放了罗平、师宗、会泽等县城。全区境内自救军各部先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罗盘（第三）支队和第六支队，形成一支由

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武工队和不脱产民兵相互配合的3万多人的人民武装力量。全区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建立起300多个党支部，各县均已建立县委、县工委。除敌重兵把守的曲靖县外，其余各县均已成立了县临时人民政府。大多数区、乡、村已有党的基层组织、临时人民政权和农、青、妇、童等群众组织。1949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五兵团各一部，追歼蒋军残敌进入曲靖，各县党、政、军、民迅速组织迎军接管和配合野战军追歼逃敌，实现了曲靖地区全境的解放。

曲靖作为滇桂黔边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的主要驻地和活动区域，是中共罗盘地委和滇东北地委所在地，是解放战争时期云南乃至滇桂黔边区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云南乃至贵州、广西的解放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经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曲靖成为云南最大的革命老区，成为曲靖红色文化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三、知国之大者，担历史使命

革命战争年代，曲靖人民不缺席、不缺位，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新中国建设时期，曲靖人民同样胸怀“国之大者”，充分发扬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发奋图强、主动作为、勇担历史使命，为党和国家分忧排难。

（一）积极投身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应对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央把全国分成一线、二线、三线3个具有军事和经济地理含义的区域。在中西部三线的纵深地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云南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利于备战，又具有丰富的资源，成为了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曲靖又称为云南省“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从1964年开始，按照中央、省委的部署，曲靖地区境内各军工企业先后组建筹建领导小组，并

开展各工厂选点筹建工作。先后建立云南铸造厂、云南铸造二厂，云南模具二厂、三厂，云南机器二厂、三厂、五厂，云南包装厂、燃料一厂、水碾一厂、龙江化工厂，云南跃进机械厂、红星机械厂、东山机械厂、金星机械厂、旭东机械厂，国营西南云水机械厂、高峰机械厂、东光机械厂等19家中央和省属“三线”企业，同时建立“三线”企业专门医院一所。三线建设期间，曲靖地区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较大贡献。与此同时，三线工厂的到来，也为曲靖带来了科学思想、时尚的观念和先进技术，改变了曲靖的经济和人口结构，促进了曲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

三线工厂的建设者们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在深山老林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用激情浇铸起共和国的军工基础，熔铸出“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这不仅是三线企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成了曲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主动安置归国华侨

1954年10月，经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局、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建立国营陆良机械化农场。陆良县将位于云南省第一大坝子陆良坝子中央，原隶属于中枢、三岔河、马街三个乡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16852.41亩土地划归陆良机械化农场。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发展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集农工商贸为一体的综合性国有农业企业。曾因装备了先进农业机械而成为云南第一个机械化农场。在那个年代，陆良华侨农场是云南的骄傲。

20世纪60年代，陆良华侨农场开始接收安置来自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的归国难侨，而陆良华侨农场也改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委托云南省华侨事务处管理该农场。从1970年开始，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第四团。1974年10月撤销军管，更名

为国营陆良华侨农场，隶属省农垦总局。1978年，农场划归云南省侨办领导管理，并开始大批接收安置越南等国的归侨和“印支难民”。

陆良华侨农场是滇东地区唯一的集中安置归国华侨的基地。1963年开始按国家政策安置从印度回国的归侨281人；1964年至1969年安置从以缅甸为主，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自费回国的归侨722人；1970年3月至1974年10月安置了下放的老干部，以及上海、四川、昆明等地的知识青年和异地复转军人及家属；1978年至1979年大批安置越南归侨及零星的老挝归侨共计2725人；1980年后陆续安置了从其他华侨农场调入的归侨156人。全场共安置过来自东南亚七个国家的归侨3899人。目前在场内生活居住的归侨来自越南、缅甸、印度、印尼、老挝五个国家共计1060人，其中越南归侨占了绝大部份。他们与居住在海外的亲友血脉相连，经常探亲互访，互通有无，形成了涉侨涉外、联系广泛的国际社会关系，把陆良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曲靖人民，把农场拿出来安置归难侨民，为党为国分忧，体现的是一种顾全大局的担当精神。

四、传红色基因，立奋进之志

流淌在滇东大地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曲靖人奋勇争先、追赶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曲靖历史悠久，自古为祖国内地入滇重要门户，是南中国第一大河——珠江的发源地，是云南开发较早、中原汉民进入云南并与世居少数民族融合开化的地区。自秦汉，曲靖即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云南与内地物资交流的集散地、中央王朝入滇的大通道。自近代以来，具有光荣革命

斗争传统的曲靖各族人民，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自由和幸福，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云南乃至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曲靖人民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地区生产总值在1994年、2011年、2018年分别跨越了100亿、1000亿、2000亿元大关。2018年末，地区生产总值攀升至2013.36亿元，经济总量居全省第二位，较1952年的0.98亿元、1978年的8.6亿元、2012年的1400.17亿元有了跨越性的提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2798元，1952年为51元，1978年为207元，2012年为23661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1.9亿元，是1952年地方财政收入1122万元的1246倍，是1978年1亿元的141.9倍，是2012年342.66亿元的1.09倍。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曲靖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济总量冲进全国地级市100强，居75位，“十三五”圆满收官，如今，正开局“十四五”、踏上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该以崇仰之情、敬畏之心认识学习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从中汲取新的智慧和力量。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上，我们更要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一定要“得思想之先”。新中国成立前，曲靖虽然偏居一隅，但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志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得马克思主义之先声，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唤醒民众，觉悟进步人士，为滇东大地红色革命奠定了思想自觉。以史鉴今，我们就是要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

一定要“干革命大事”。滇东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先进人物和英雄事迹，形成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沉淀为流淌在滇东大地血脉里的红色基因。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用先驱先烈先辈们的鲜血染红了滇东大地。他们不计名不计利的情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怕牺牲、甘洒热血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大力弘扬。“打江山难，守江山不易。”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是革命圣地，不容玷污！守好革命圣地，就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敢于自我革命，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构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一定要“担历史使命”。曲靖人民是有担当的人民。革命战争年代，滇东儿女舍生取义；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三线建设不讲条件；国家外交风云危难之际，曲靖敞开怀抱迎接归侨难民。可以说，这是一片有担当、能奉献的热土。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上，我们更要“知国之大者”，勇挑重担，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服务 and 融入国家战略上着力，在助推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上当先锋、做表率。

一定要“立奋进之志”。国家危亡之际，一大批从曲靖走出去的滇东儿女参加“重九起义”、“讨袁护国”；白色恐怖年月，无数仁人志士“不畏难、不畏强”，在黑暗中探索光明，在艰难困苦中救亡图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曲靖人民“奋发向上、只争朝夕”，取得一个又一个载入史册的成就。回顾历史，激励当下。就是要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志，始终保持“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奋进姿态，开局“十四五”，建功新时代。**社科**

责任编辑：张兵

自我革新 负重前行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 梁峻豪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坚强、勇敢的民族。越是在至暗至黑的时期，越会涌现出一大批为民请命、为受冻者抱薪、为自由开道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人。

毛泽东同志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了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灾难深重的悲惨境地，为了救民族于水火，一大批仁人志士苦苦探寻着救亡图存的道路。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但这一批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败，依旧走不出苦难的泥潭。

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让中华民族看到了冲破黑暗的希望。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

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做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也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到工人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机遇，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建立。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也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

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评价的那样：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变了方向。”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精力主要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

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者，十分重视共产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成为时代的号角；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宣传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汇集了极大的革命力量，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组织工人方面，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产业和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时负责湖南党务的毛泽东很重视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先后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工作。他们以“平民教育”为名，在安源开办平民小学和工人补习学校，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通过罢工等方式为工人争取利益，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所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用暴力摧毁专制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如果不使用革命暴力，如果没有“枪杆子”，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暴力，就不可能摧毁旧的

国家机器，更谈不上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最终只能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中任人宰割，毫无还手之力。

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但他的这一论断并未得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主要领导的认同，甚至还遭到了排挤和打压。但不久以后，残酷的现实则给共产党人当头一棒，上了一堂刻骨铭心、代价惨痛的课。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使中国大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摧残和打击。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的有30多万，被监禁的有4600多人。中共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月时的5.7967万人，一下子降到11月份1.765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

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教训，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逐渐清醒过来，深刻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地了解、分析、论证之后提出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

到了7月份，局势更加严峻。7月15日，武汉国

国民党政府宣布“分共”。

面对愈加严峻的形势，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存亡之际，拿起了枪杆子，实施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波澜壮阔的武装暴动、军事割据，展开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真枪实弹、针锋相对的革命斗争，并得到逐步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确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由于苏俄革命走的是一条占领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在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坚持下，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革命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采取的是“进攻进攻再进攻”的革命方式。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不堪一击，新建立的革命政权仅仅坚持3天之后便遭到了强大敌人的残酷镇压，被迫退出城市，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偏僻地区寻求立足之地。

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则避实击虚，退出城市，另辟蹊径，建立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割据，为中国革命进行了极其重要的探索和实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抵达江西省宁冈县的砻市与毛泽东统率的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正如两支铁流汇

合在一起，形成了红军的主力，保存并增强了革命武装力量，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的崭新局面，推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进行了决定性地实践探索。

随后，毛泽东等人又在赣南、闽西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号召受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翻身斗地主，革命运动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根据地面积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让国民党反动势力如鲠在喉、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

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井冈山红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声势不断壮大，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让国民党谈“红”色变，寝食难安。

与之相反的是，从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和开展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历经了4年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之后，由于党内高层领导的相继被捕叛变，致使置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同时，反动势力不断加大对共产党员和党中央机关的搜捕力度，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被迫于1931年陆续迁至江西瑞金。

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挤，毛泽东失去了领导权。但在朱德、周恩来的领导下，仍然延续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术，面对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红军仍然取得了胜利。

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共

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以及蒋介石军事、政治战略的改变等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仓促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到达陕北，得到了休养并扎下根来，逐步成长得枝繁叶茂，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长征途中，红军遭受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形势非常严峻，险象环生，伤亡十分惨重。在生死存亡之际，广大指战员和部分中央高层领导开始反思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发生的错误和存在的问题，并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强烈要求毛泽东继续领导红军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极其紧迫的形势下，遵义会议召开了。

1935年1月初，红军攻克了遵义城，得到了一次喘息和休整。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途中不断遭受的惨重损失和被动挨打的局面，红军前途堪忧。

痛定思痛，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商议提出，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存在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和红军的出路等重大事宜。

1935年1月15日，会议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中央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共20人。

会议连开了3天。会上争论得异常尖锐和激烈。会议由博古首先作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而周恩来的报告则实事求是地检讨了主观方面存在的错误。随后，张闻天则针对博古的报告提出了针锋相对地反驳和批评，张闻天严厉地指责和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认为是博

古在领导上存在重大的失误，将红军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一个教条主义、瞎指挥的外国人李德，听不进正确意见，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盲目冒进造成的。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指出：“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朱德也对李德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表示这种局面如果再不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王稼祥则在发言中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继续指挥红军。

经过激烈地争论，思想得到逐步统一。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

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四、北上抗日，肩负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担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之间发生的“北上南下之争”，是一场关系到红军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的生死存亡的争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侵华战争，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名左右的日军击溃。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就摆在了面前。

在红军的发展方向、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上，中共中央认为川陕甘地区地域辽阔，多民族杂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势力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有利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以避免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另外，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一路艰苦的战斗，损失惨重，兵力已不足3万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多人。面对双方兵力悬殊，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开始膨胀起来。为了保持红军的团结，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副主席，但他并不满足，一再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意图索取更大的权力。这是“北上南下之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为解决这个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向北

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于29日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增补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军委委员，以加强对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

张国焘表面上对北上的战略方针表示赞同，会后却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并仗着人多枪多，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要求，只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至此，张国焘才调兵北上。

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一起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提出要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新疆等地的错误。但张国焘仍一意孤行，抵制中央作出的北上战略方针。

8月底，右路军历经千辛万苦通过了草地。但张国焘却不顾中央的一再催促，要求已进入草地的红军返回阿坝。9月5日，他命令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8日，他又命令右路军南下，并要求中央“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同时还命令左路军中驻马尔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转令军委纵队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若不从，就将其扣留。

中央再次劝告张国焘，强调南下是没有前途的，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甚至背着党中央，给右路军领导人发密电，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得这份电报后，立即报告

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遂于10日凌晨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们》，指出“南下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同时，致电张国焘，争取左路军立即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并号召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促其北上。

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张国焘则坚持错误，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1936年6月，南下红军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剿下，损失过半，难以立足，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至此，“北上南下之争”才尘埃落定。

“北上南下之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在生死存亡之际，高层内部的又一次严重的分裂和生死攸关的转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敌后展开了艰苦卓绝地抗日斗争，并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最终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挽救了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得到了快速地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就“和平建国”展开了重庆谈判。谈判失败后，共产党带领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继续展开斗争。

1947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基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1949年10月1日，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到1950年6月，残存在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被全部歼灭，蒋介石带领少量军队逃往台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此，解放军完成了解放全国大陆和近海岛屿的任务，统一了中国大陆。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一面继续革命，不断巩固新生的政权，一面只争朝夕，恢复生产，致力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使新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以及极“左”思想的严重影响，中国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随着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相继去世，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中国在“十年动乱”的危机中风雨飘摇，国际社会却在飞速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万物思春。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

在这次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

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转折。

（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三中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

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

（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此后，中华民族这艘远洋巨轮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奋力远航，不断谱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美乐章。社科

责任编辑：张 兵

陆良暴动：打响滇东武装革命第一枪

■ 张建刚

宽阔的陆良坝子，不仅是滇东粮仓，而且是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革命圣地。但在西桥炸滩疏浚南盘江以前，陆良坝子水患不断，陆凉州是有名的四大穷州之一。因百姓生活困苦，反抗意识强烈，党组织很早就把这里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点区域。

开辟旧州根据地

出生在曲靖三宝三百户营的康建侯（原名金耀曾），在胞兄金述之影响下早年到广州投身革命。其兄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投入滇军开赴广东后转战江西。1928年初康建侯离开江西回到云南，秘密与党组织接上头。

1928年春节，在昆明求学并创办革命刊物《陆潮》的东陆大学学生程熙文（又名程杲，中共党员，陆良旧州人），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向乡亲们宣传“军阀不消灭，战祸不能免”的道理。程熙文的动员，点燃了旧州村马朝亮及其青年伙伴们心灵的火花。

1928年12月，熊从周从建水调任陆良县长。熊到陆良后，中共云南省临委先后派党员吴永康（吴建德）、王启瑞（王吉辉）、赵光明（杨东明）、康建侯（金耀曾）、徐文烈、丁锡禄等到陆良，他们以城区、马街、三岔河、旧州等地的学校为据点，秘密组织革命活动。

1929年3月，按照省临委的决定，在陆良县第一小学建立中共陆良特别支部，吴永康任书记，朱光华（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俞文侯（后叛变）、杨立人为委员。特支成立后，陆良一小校长朱光华积极活动，在教师和学生中又先后发展汪德生、张秉仁、陈发、毕光星、马如龙等入党。陆良受到省临委的高度重视。

1929年6月，省临委书记王德三以卖药为掩护，到陆良视察了解当地的民情地理和党组织发展情况，指示陆良党组织的发展不应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学生，还应面向农村和社会各阶层。接着，张经辰（省临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国柱（省临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等也先后到陆良检查指导工作。根据省临委的指示，中共陆良特支以合法形式，在城乡青年中广泛组织禁烟禁赌会，在群众中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9月，省临委书记王德三等再次到陆良检查指导工作，帮助陆良特支制定《陆良工作大纲》。在陆良，王分析了全国、全省及陆良形势，提出要注意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问题，并指示陆良党组织以城区、马街、三岔河、旧州等地为重点开展工作。同时，将中共陆良特支书记吴永康安排到三岔河小学任校长。康建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陆良旧州小学，以校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回汉聚居的旧州村，地处曲靖、陆良的交通要道南盘江河边，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康建侯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和党的宣传、统战工作。白天，他奔走于南盘江西岸的广大

作者简介：张建刚，中共曲靖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

农村，走村串户，进行革命活动。晚上，借用这里的校舍，把各族青年农民组织起来，办夜校读书识字，开展文娱活动，宣传党的主张。一天晚上，他同青年们玩游戏，一边玩，一边大声问：“你们敢不敢干革命？”大家答：“敢。”问：“你们愿不愿跟我走？”大家答：“愿。”问：“你们怕不怕死？”大家答：“不怕。”声音洪亮，情绪高涨，连学校附近的各族群众都经常到学校里看热闹。康建侯还自编歌谣揭露贪官，教育群众。其中一首歌谣是：“贪官手杖八丈长，拿起朱笔坐法堂，装满腰包享清福，讨小老婆盖洋房。”歌词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康建侯不但在校内发展革命力量，而且还注意争取地方实力人物到革命队伍中来。受秘密指派，康建侯与程熙文多次到白鹤堡方鹤鸣家里做团结教育工作。最后，方鹤鸣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接着，陆良县长熊从周委任方鹤鸣为县团防大队的中队长。并令方部歼灭了明团暗匪、作恶多端的惯匪计明善，还借助方的武装力量与孙渡胞弟县团防大队长孙玉山的武装力量抗衡。

康建侯在旧州村开办平民夜校，马朝亮等年轻人有时也到夜校读书识字，听革命故事，唱革命歌谣。在程熙文的影响和康建侯的教育下，马朝亮进步很快，并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他组织了40多人，加入到实际上为中共陆良地下党掌握的方鹤鸣为首的陆良县团防队中，方鹤鸣部人员壮大到300人。团防队驻曲（靖）西（桥）公路咽喉地带白鹤堡，除暴安良，北与曲靖地霸海中鳌的武装对峙，东与国民党县团防大队长孙玉山的武装抗衡。方鹤鸣、马朝亮及其部属，不抢劫，不扰民，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开展革命斗争。

宣传部长两到陆良

1930年1月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央指示和省临委扩大会议、省委全会的决议，加强对云南全省各地工作的领导。同时，根据“六大”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巩固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方针，“尽可能领导经济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的指示，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大力发展群众组织。

随着工作的开展，省委决定在陆良县组织武装暴动，并两次派省委宣传部长张经辰到陆良部署和检查暴动的准备工作。在严峻的斗争中，张经辰机智勇敢，与敌人周旋，外出时巧妙化装，长袍短衫频繁更换，有时还扮成老翁，来无踪去无影，就这样，他多次躲过了特务的跟踪。

1930年春，张经辰第一次到陆良县，对陆良县党组织作了调整，在原特支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中共陆良中心县委，书记吴永康，委员王启瑞、赵光明、徐文烈、康建侯，负责县委的日常工作。下属3个支部，城区支部书记王启瑞，三岔河支部书记吴永康（兼），马街支部书记赵光明。具体分工为：吴永康负责东区（三岔河片），王启瑞负责城区（中枢镇），赵光明负责南区（马街片），康建侯负责二区（旧州一带），徐文烈负责六区（老鸦召一带）。

1930年4月，康建侯发动旧州小学师生声援党领导的马街、三岔河等地学生运动取得胜利。旧州，成了中共陆良地下党的活动根据地。

1930年5月，张经辰第二次到陆良县，在旧州会议上成立了以吴永康为首的兵委会以组织领导全县的革命武装。这一段时间，由于省委对陆良工作的重视并加强了领导，加之有中共党员熊从周以陆良县长的合法身份掩护党的活动，给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整个暴动准备工作发展较为迅速。

中共陆良地下党组织从特支到中心县委，为了团结陆良各族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根据省委的部署，党的工作以学校为据点，通过公开的合法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统战工作与下层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学运、农运和兵运，广泛对青年学生、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经过充分准备，中共陆良中心县委统一了思想。

1930年6月，由吴永康赴省汇报，要求迅速组织武装暴动，当时省委书记王德三外出，在昆明主持省委工作的张经辰听取汇报后，认为当前滇军大

部分开出省外作战，仅张凤春部留守滇南，陆良暴动时机已经成熟，即代表省委批准了陆良暴动计划，并部署武装暴动占领陆良县城，急袭曲靖，由曲靖地下党组织接应，若是龙云从滇南调军进剿，如果难以坚持，可向滇桂黔边境转移，与广西百色苏区联系，在滇桂黔边境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并指示暴动武装暂编为红军第38军，强调做好准备工作，暴动时间由陆良党组织根据情况掌握决定。

组建陆良暴动班底

吴永康回陆良后，传达了省委指示，经党组织讨论，把党掌握近千人的地下武装暂编为红军第38军，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吴永康为首的“兵委会”，吴永康、康建侯、方鹤鸣三人为领导小组成员，所设临时建制有：政治部、军直属部队和三个师一个独立混成旅番号。军长吴永康，政委待省委指派；军直政治部主任保其贞，副主任骆德昌（骆彪）、高荣昌，秘书保维德；军直属部队高培昌、保墨轩；第一师师长康建侯，副师长马朝亮；第二师师长方鹤鸣，副师长陈东祐；第三师师长朱绍庭，副师长徐文烈；独立混成旅旅长殷祖佑，副旅长杨东明。并由政治部负责制作了军和师的军旗、印章等。

经研究，整个暴动计划时间定于1930年7月3日晚上。暴动部队分两路进攻县城，一路以三岔河为中心，集中召夸、老鸦召和马街的武装，扫除国民党团防大队长孙玉山的地方武装后，作为攻占县城的正面主攻部队；另一路即旧州、白鹤堡的一师和二师，计划由白鹤堡出发，把板桥、旧州地方武装势力扫除后向县城进攻，作为侧面部队与正面部队配合攻城。同时，张经辰还到马街与开明人士杨体元进行接触，争取他支持陆良的革命斗争。城内王启瑞负责组织县初级师范师生及一小、二小两所学校的教师作内应，以卷左裤脚为暗号，口令是问“暴”答“动”。

县委制定的武装暴动具体方案秘密传到张经辰手中后，张经辰及时向省委书记王德三作了汇报。王德三叮嘱张经辰要把军事行动布置周密，特殊情

况不用汇报，立即决断。

陆良暴动组织者，大都经历了艰苦的革命考验。



王德三

王德三，云南祥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州黄浦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被党组织派回昆明，任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书记，历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中共临时云南省委书记，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在云南的党组织。1930年1月，当选为中云南省委首任书记。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2月31日，王德三被枪杀于昆明，年仅32岁。



张经辰

张经辰，云南禄丰县人，1903年10月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张经辰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1929年春回云南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等职。1930年被捕，12月31日被反动政府杀害，年仅27岁。

吴永康，会泽县小乌龙村人，1924年考入云南省第三师范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省临委派吴永康到陆良第一小学任教，后调往三岔河小学任校长，1930年陆良暴动任暂编红军38军军长。

康建侯，曲靖三宝人，1923年就读于昆明成德中学，1926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省临委派其到陆良旧州小学任校长，以校长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30年参加陆良暴动并任暂编38军第一师师长。

方鹤鸣，陆良板桥白鹤堡人，青年时投入滇军胡若愚部，后因作战勇敢升为营长。1927年滇系军阀混战，率陆良籍士兵回乡。1929年，熊从周县长委任他为县团防大队中队长，1930年陆良暴动时为“兵委会”成员，并担任暴动部队暂编38军第二师



方鹤鸣

师长，暴动失败后被叛徒杀害，年仅31岁。

第三师师长朱绍庭，早先由中共地下党员徐文烈统战争取过来，但意志不坚定，战斗不积极，后妥协变质。1930年春，省临委对陆良党组织作调整时，建立了中共陆良中心县委，徐文烈为委员，负责六区（老鸦召一带）的工作。徐文烈在召夸、老鸦召一带秘密组织发动了由青年农民和学生组成的50多人的革命武装，还对小者黑的分团首朱绍庭做统战工作，争取人枪二百多。同年5月，省临委批准陆良武装暴动计划时，徐文烈力荐朱绍庭当师长，却看不准他的本性。



徐文烈

徐文烈，宣威板桥人。陆良暴动失败后，徐文烈转移到昆明。1935年4月，红九军团进驻宣威板桥，徐文烈参加红军，参加多次战斗；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徐文烈调八路军120师工作，英勇作战，善于指挥，解放战争

期间，担任多个重要职位指挥作战；1950年10月25日，徐文烈率五十军入朝作战，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和渡海攻岛作战。1954年2月，徐文烈奉调回国，协助刘伯承等领导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各一枚。1959年12月，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76年12月含冤去世，享年67岁。

打响陆良武装斗争第一枪

1930年7月3日晚，陆良暴动按计划推进，暴动部队兵分三路。

旧州、白鹤堡一路，由第一师、第二师的师长康建侯、方鹤鸣率领，首先摧毁了敌板桥公安分局，在河边乱葬岗（原板桥卫生院西侧）枪毙了局

长卢永庆等四人，随后奔袭旧州敌分团首李兰亭的老巢，马朝亮、陈东祐冲锋在前速战速决，击毙了李兰亭，首战告捷。他们急行军20华里，到城外普济寺、大泼树一带等待三岔河一路的正面攻城部队前面汇合，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县城。

三岔河一路，由军长吴永康指挥军直部200余人武装，天黑进入埋伏地，包围了孙公馆，当时县团防大队长孙玉山的住宅（孙崑，字玉山，是当时任龙云的参谋长孙渡的胞弟）。吴永康派侦察员陈玉才两次侦察，发现敌人毫无戒备，静待马街、老鸦召的武装会集后，准备行动。然而一个意外插曲打乱了阵脚。三岔河一个外号叫“鸡司令”的惯偷，恰好在当晚邀约了一伙人抢窃曲靖商人停泊在城东盘江边关圣宫的黄豆船，商人急忙到孙公馆报案，团防大队长孙玉山吹哨紧急集合武装人员出动往盘江赶去，暴动部队一时弄不清实情，误认为暴动机密泄露，敌已有准备，吴永康等研究认为敌人武器精良，并弹药充足，硬打就要吃亏，决定停止行动，分散回原地听候通知。由于判断错误，没完全弄清敌情，错失战机，前期精心准备落空，计划被打乱。

独立旅留在县城做内应，待一、二路完成任务后到普济寺汇合。城内部队做了充分休整，准备随时接应攻城主力。陆良城分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并设有钟鼓楼，任何一方有响动，在钟鼓楼都可瞭望并发出攻守信号。当天王启瑞、郑明昌、罗宗祐、张镇枢以县师范学校碾米为由，拿到了城门钥匙，通夜半开东门。天黑前，城防负责人跟往常一样，派当天值守城门的人作了巡查，按时打更报平安。李希白（李子坚）派亲信张秉仁、黄德名、何汉名持械把守南门，并派人察看了团防总局、公安局，均无戒备，汪德生等二十余人准备了大量的手电筒，等待两路会师的攻城部队到来。

南区马街方向的赵光明、殷祖佑等人组织民间马帮武装80余人准备战斗，但未接到信号，悄悄解散，隐蔽下来未暴露踪迹。

旧州、白鹤堡一路在指定地点焦急等待主力部队，但始终不见三岔河方向的武装力量出现，一

时又联系不上其他人，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潜伏下来，在普济寺等到快天亮时都没有等到东路部队的踪影，估计出了问题。东路军判断失误，仓促解散，错失良机，消灭县团防大队长孙玉山武装的任务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因而两路暴动武装未能汇合，致使暴动失败。等到天快亮时，方鹤鸣、马朝亮当机立断，绕城而过，毅然指挥300多人的暴动武装拉上白鹤堡后山隐藏起来，后又北撤离开陆良坝区，向磨盘山转移，进入牛头山区。

陆良暴动尾声

由于暴动缺乏经验，指挥失误，陆良暴动失败，部队撤退离散，白色恐怖笼罩着陆良。曲靖县长段克昌闻讯，星夜派人上省城禀告龙云称：“共党在陆良暴动，请主席发兵进剿。”龙云电询熊从周，熊接电后沉着应付，随即复电：旧州事件系私人仇杀，限一星期办毕俱报，不必兴师动众。熊从周被迫表面奉命缉拿起义领导人，实则把省临委派来的党员干部王启瑞、徐文烈等秘密送出境；对于康建侯，表面上公开悬赏捉拿，暗地保护转移。康建侯等经曲靖、昆明安全转移到麻栗坡、马关、西畴等地，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熊从周在会同省府陪审官公审几个被俘农民时，只牺牲自称参加暴动的个别农民，竭力保护参与和拥护革命人员，不承认参加暴动的以证据不足立即释放。接着，熊从周以“无名散匪假借共党之名，行抢劫报仇之实”上报，机智果断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善后问题。

1930年7月18日，孙玉山亲自指挥县团防大队和南区、西区、北区3个联防团队1000余人，配合曲靖、马龙、沾益等县地方团防队2000余人，前往牛头山区“兜剿”暴动队伍。暴动队伍在红石岩、滑泥坡等地多次与敌激战，先后毙伤敌10余人。经过一个半月的较量，终因兵力、武器悬殊过大，暴动部队被冲散。方鹤鸣同少数人脱险后在磨盘山农民的田坊里休息。方鹤鸣过去吸过鸦片，在山区辗转躲藏多日，又犯烟瘾，哈欠连天，困顿不堪。混入部队的反动族长方茂图（方斋公）怀有异心，他假装去为侄儿弄烟土，悄悄与方绍堂（外号“猫

脸”）密谋，乘方鹤鸣熟睡之机，指使方绍堂用大石头把方鹤鸣残忍砸死。主要指挥员方鹤鸣及战士10余人壮烈牺牲，4人受伤被俘。方茂图（保董）得手后欣喜若狂，他赶往县政府向熊县长讨好请功。熊县长听完方茂图喜形于色的报告，心里对这种背叛子侄邀功请赏的奸诈之徒痛恨至极。一番讯问后，熊从周借口“倡乱者应陪杀，拉出去走走”，暗令执法官坚决处死杀害方鹤鸣的凶手。枪响处，首先倒下的就是这个叛徒。方茂图到死都不明白熊县长的底细。原来，这一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熊从周坐镇指挥，事先布置好的除奸行动。

在山区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马朝亮、陈东祐等各自为战，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浴血奋战中，被敌人全部打散，各自突围脱险。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马朝亮带领少数武装隐蔽牛头山区，积极保护革命力量。其间，马朝亮曾组织攻打旧州保董李介藩的住宅和车马堡乡公所，不断给反动武装袭扰和打击。

在省委领导下，陆良举行暴动的同时，宁洱、墨江、东川（会泽）等地的暴动也在准备之中。然而，在1930年底，因叛徒告密，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主要成员相继被捕，革命陷入低潮。

陆良暴动，震撼全省。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榜样，也为后来陆良党组织的建设，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准备了人才。但暴动也激怒了反动当局。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以策划暴动为名，下令将5月抓捕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平楷，军运负责人张舫秘密杀害于昆明模范监狱。

陆良暴动打响了滇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一次尝试，它震慑了反动统治集团，播撒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火种，为云南党组织早期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云南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社科

责任编辑：韩 瑞

罗平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考析

■ 杨丽萍

一、罗平“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状况

“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位于罗平县城中心液峰公园内，1939年元旦修建于县城西北方的太液峰公园旁，2003年12月迁立于现址，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二普登录项目——罗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项目”。主体文物包括“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汪精卫夫妇石雕跪像”。

（一）“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由碑额、碑身、碑座和基座四部分组成。碑额为圆帽形，高0.7米，碑身高1.76米，宽0.41米，四面均用隶书阴刻“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九个大字。碑座为梯形台，上口宽1米，下底宽1.1米，各边均高0.3米；基座为三级台阶方形台面，边长为2.76米。台面四周均置石质方柱，柱头为球体，通高0.57米，边长0.2米，柱距为2米，四周用铁链穿柱相围，基座占地17.31平方米。纪念碑保存完整，结构稳定，原貌尚存。但因长期风吹、雨淋、日晒，导致局部风化。特别是1941至1986年期间，被推倒移至看守所后，接触地面一面因长时间受侵蚀腐蚀，损毁较为严重，“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原字迹基本看不清楚，之后维修时，已按原字迹描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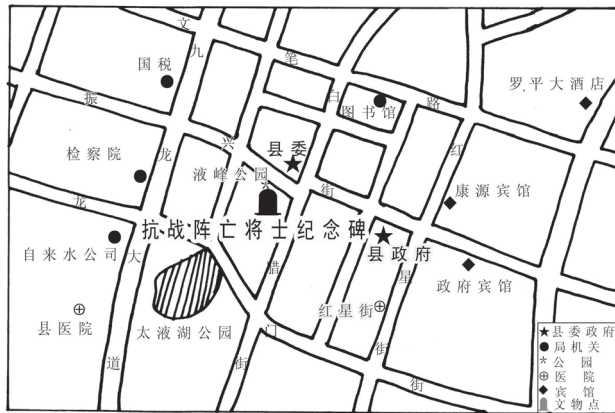
（二）汪精卫夫妇石雕跪像

汪精卫夫妇石雕跪像为单体，均为赤身、反绑、求饶的姿势，神情沮丧，与跪石为一整体，长

跪在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汪精卫石雕跪像高1.1米，跪石长0.54米，宽0.38米，厚0.14米，正面阴刻“汪逆精卫”字样；陈璧君跪像高1.07米，跪石长0.53米，宽0.35米，厚0.13米，正面阴刻“陈逆璧君”字样。石跪像于1941年被推入太液湖中，1986年5月修湖时捞出，同年9月修复保护。因经多年风吹、日晒、雨淋，局部风化严重，2010年4月文化局对石跪像进行修复，因人为破坏，增设金属防护栏加以保护。

二、刊石树立“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历史背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位置示意图

图一、“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位置示意图

作者简介：杨丽萍，罗平县文物管理所。



图二、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整体

罗平各族儿女顺应时代要求，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些热血青年积极要求参军参战，奔赴前线，以热血保卫祖国。为缅怀在抗日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将士，1939年元旦罗平各界人士捐资修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于县城西北方太液湖旁。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之下，汪精卫对于国家的未来产生了很大的疑惑，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一片惨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相信了日军所宣传的政策。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撤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12月18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托词到成都军官学校讲演，按预先策划好的叛国降日路线，带着老婆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等人登上飞机，偷偷飞往云南



图三、汪精卫夫妇石雕跪像

昆明，之后又匆匆从云南昆明飞往越南河内。29日发表了响应日本近卫首相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翌日，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如此公开叛国投敌，拜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脚下，从此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为深切悼念死难烈士，唾骂卖国汉奸，罗平人民着眼于民族精神，国家大势，建造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汪精卫夫妇跪像”，意在激励大后方民众团结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

三、“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特殊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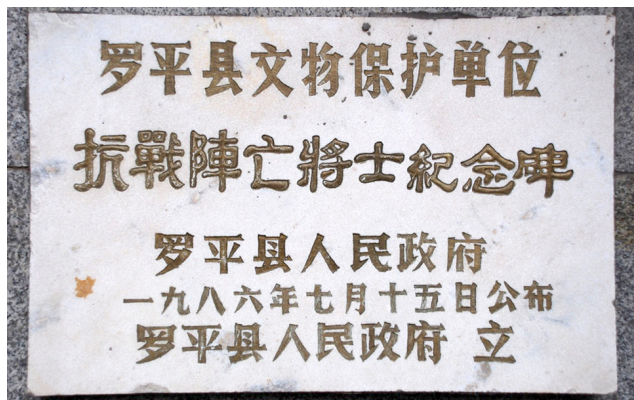
“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是罗平人民为深切悼念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难的烈士而立的纪念性建筑。在严峻的战争年代，建此纪念性建筑，意在激励大后方民众团结一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英勇决心，具有很高的历史纪念价值，叛逆汪精卫夫妇石雕跪像，寓意对一切汉奸卖国贼的永远惩罚。赤身反绑

并跪地，造型在真实中带有夸张，在云南省独一无二，夸张的造型说明了民国四大美男子之冠——汪精卫其实是虚有其表，他的卖国行径已经永远把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像人们感叹的那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表达了汉奸应受到唾骂与严惩，应向烈士们赎罪、向全国人民赎罪。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罗平人民“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浩然正气。“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汪精卫夫妇跪像”，向世人述说了罗平的革命斗争史，是历史的见证物，是挖掘历史、激励后人、弘扬中国人之浩然正气的实物资料，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保护情况

1940年6月，国民党罗平县党部勾结驻军以“异党分子”罪名逮捕了中共罗平地下党县委书记刘璧华和进步人士尹兰冰，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尹刘事件”，共产党领导的罗平抗日救亡斗争，因此由公开转入秘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命运也几多风雨几多愁。1941年10月，国民党罗平县党部以怕日军飞机轰炸之借口，派人将“汪精卫夫妇石雕跪像”推入太液湖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也被推倒。1983年5月，县文化馆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被推翻的纪念碑在看守所的一个角落里，便登记保护。1986年5月，县水电局在整修太液湖时，从烂泥中捞出了汪精卫夫妇石雕像。同年9月，罗平县人大十二次会议决定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列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6月，县人民政府拨款，由县文化局将碑和石雕像搬迁至县城工人文化宫内，并增设金属防护栏加以保护。2003年12月，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由县文化局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汪精卫夫妇石雕像”迁立于县城液峰公园老博物馆右侧，实施保护。2012年罗平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罗平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修亭子加以保护。2013年5月被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利用情况



图四、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志牌

“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与“革命烈士纪念馆”同位于罗平县城中心的液峰公园内，并长期对外免费开放，充分发挥了文物“鉴史、资政、育民”的教育功能。如今的液峰公园已成为对中小學生、干部群众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每年清明节，中小學生、武警官兵、干部群众等纷纷向英烈献花圈，向英烈默哀，向英烈宣誓。多年来，每逢公祭日、七一建党节和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日，来自贵州、广西、云南的老革命、党员干部、烈士家属到此缅怀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罗平县各直属机关单位到此组织开展主题活动。这里已逐步形成红色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的重要基地。

革命文物是中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爱国主义教材。革命文物，弥足珍贵，需保护好、利用好。烈士精神，永垂不朽，需传承好、发扬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了面对敌人的野蛮、残暴，烈士们不甘示弱、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力量源泉，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罗平人继续前行。社科

责任编辑：陈诗珏

兴修水利惠民生 陆良旧貌换新颜

■ 杨 辅

陆良是我的故乡。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有这样一首民谣：

陆良，陆良，平坝无水最荒凉。（云南第一大坝子）

忽然一夜盘江雨，旱地成河田成江。

虽然在清代民国年间亦有仁人志士率领队伍兴修过一些水利设施，但因历史社会等原因限制，也只是小打小闹。史载：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平均亩产约150斤。其中水稻亩产180斤，包谷亩产120斤，蚕豆亩产100斤，小麦亩产140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极大的注意。”陆良县委、县政府结合实际，认为要解决吃饭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因此提出了“上段蓄水、中段圈圩和抽水排涝改造荒海、下段炸滩排阻，畅泄洪水”的根治南盘江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治水首先是在发源于路南县路花村的麦子河上修水库。麦子河水库既是新中国成立后陆良首建，又是云南省水利建设“试点”的中型水库。施工期间，省水利局组织部分州、县水利

部门的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到工地参观指导、学习。曲靖、沾益两县出动民工1800余人参与协作修水库。山遥路远的嵩明县亦出动马车参加运输。来自县内各乡镇的民工看到远道而来协作的人马和过去从未见过的壮观场面实为感动，又一次亲身感受到“共产党辛劳为人民，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真情实绩。工地上施工人数最多时有12017人，上坝土方51万立方米，当时没有电力，坝体的碾压工具是3.7吨的羊角碾，100-120公斤的石碾，40公斤的铁飞碾，都是人工操作。工程施工虽然又苦又累，但翻身后的农民群众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经过近8个月的奋战，蚂蚁搬泰山般地筑起了一道高21.2米，顶长670米的均质土坝。水库设计库容1350万立方米，1956年开始蓄水近8000立方米。

1957年春耕时节，马街、环城两个地区天不下雨就开始栽秧了，得益于麦子河水库的灌溉，激励了全县干部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从此，在“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兴修水利”方针的指引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高潮，年年规划，年年兴建：1958年修建中型蓄水工程板



作者简介：杨辅，陆良县文联退休干部。



桥河水库，又在南盘江上筑起石坝拦水，称：响水坝水库；1959年、1960年兴修大型水库“独木水库”（后划归曲靖县管辖）；1960年至1961年，排涸中原泽（陆良海）和旧州海等10几个荒海，开垦出良田10余万亩。1971年至1972年修建中型水库永清河水库；1972年至1976年修建莲花田水库。至1976年，陆良共兴修大型水库1件、中型水库5件、小（一）型水库18件、小（二）型水库72件。陆良县步入“云南省兴修水利先进县”行列。二十几年的水利建设工程倾注了多少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心血！其规模之大，效益之高，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至1976年，陆良坝子已变成沟渠纵横，山区半山区人工“湖”星罗棋布，诗赞：“深山现明珠，坝闸锁蛟龙”。

炸开西桥石滩是陆良水利建设史上的“持久战”。史载：民国18年（1929年）县长，熊从周（中共秘密党员）为减轻陆良洪涝灾害，向省政府数次申请，经批准由建设厅拨发滇币5万元，当年西桥炸滩首次开工。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开炸西桥滩遇阻问题，一场更大规模的炸滩行动在此时开始。从1955年开始，每年2至4月枯水季节即数千人进驻西桥滩，至1977年，炮声在这条河床里轰鸣了22个冬春，终于炸开了从油虾洞至五眼洞全长9.21公里，平均炸深2.5米，宽50米的石滩河床。省里一位水利专家说：“就炸滩而言，陆良县的西桥滩开炸，战线之长，年代之久远，在云南水利史上是罕见的”。

1983年，“云南省精神文明现场会”在陆良召



开，笔者奉命随县委书记艾家模下乡调查各乡镇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搜集资料。之后笔者创作了一台描写陆良地方音乐史诗舞蹈体裁的，题为《故乡之歌》的晚会节目，其中有歌词这样唱道：

南盘江呵，南盘江……，
 黑暗的年代你流尽了眼泪。
 苦难的岁月你布满了创伤，
 嗯……陆良坝子满目荒凉！
 卖工打马下罗平，上宜良，
 当沙丁下个旧，做帮工把昆明闯。
 爹挑着因，儿牵着娘，
 四面八方去逃荒……

1976年，陆良县委、县政府根据老盘江湾道太多，流水不畅及1973年、1976年洪水倒圩泛滥成灾的教训，作出“丢掉老盘江，开挖新盘江”的决定。

1977年11月25日，全县9个公社的干部、社员和县机关干部、工人及飞机场空军86112、86110、87381等部队干部战士5万余人召开“根治南盘江誓师大会”，从这天起，每天都有四五万人出工开挖新盘江，最多时达6万余人。县级机关干部白天开盘江晚上办公。据当时统计有4.5万余民工常在工地食宿，其中有党、团员5716人；有夫妻1261对；有60岁以上老人700余人。省、市新闻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对陆良开挖新盘江的壮举也作了多次报道。记得1977年，我和同事们居住的小院里腊梅花正在开放，每天龙海山头刚发白便起床和同事们挑粪箕扛锄头上新盘江工地挖河。当来到工

地一看，此时的南盘江工地已是人头攒动，万杆红旗飘扬了。

笔者还为此创作了一首题为《南盘江小唱》的歌曲在工地传唱：

数九寒冬腊梅香，共产党号召治盘江。

全县人民心喜欢，拥护党的好主张。

从1977年11月开工至1978年5月，经过半年多的大战、苦战，共用去10076350个工日，于1978年5月，一条长25.3公里、江口宽70米、底宽45米、平均深6米的新盘江像一条玉带般展现在陆良坝子里，比老盘江缩短13公里。主体工程已基本开通，转入新盘江配套工程建设。新盘江上建起节制闸3座；各类桥梁23道；渡槽5座；抽水排灌站68道。从此，彻底告别了南盘江洪水泛滥成灾的岁月，做到了旱涝保收。

1979年春，陆良县委、县政府在县城南门外新开的河道里开庆功大会，笔者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主席台两侧：

新盘江，庆通水，淌走一穷二白；

陆良坝，闹春耕，迎来万紫千红。

水利的变化，改变了农业生产面貌，再加上毛泽东“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实施，至1977年，全县二十一万亩水田已有十七万亩排灌自如，稳产高产。1977年稻谷均产达756斤，三岔河等地不少水稻已亩产1000余斤，称为“吨粮田”。

自从新南盘江开挖好以后，洪水灾害不见了。



否则，那些夜晚阴雨连绵不断，广播里只要一唱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歌，就是县里又号召县级机关干部防洪去啰。

1957年陆良调出粮食1528万斤。1972年，承担调运援助越南特级大米1569万斤，之后，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大米调往昆明。9月又接受紧急任务，支援贵州救灾，调运大米2750万斤，连同其它任务，当年共调运粮食5509万斤，其中大米95%。1978年调出粮食3641万斤，之后每年都有粮食调出。从此，陆良被誉为“滇东粮仓”。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陆良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滇东粮仓”、“高原蚕丝绸之乡”的美誉代替了“干坝子”、“四大穷州”的贬语，时至90年代初，陆良综合实力已跃入云南十强县行列。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今天，陆良已被列为云南省现代农业示范县、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县，是全省粮食、生猪、蚕桑、烤烟生产基地县。

因兴修水利的巨变，陆良旧貌换新颜。情激之下用一副对联赞之：

两千年历史，春去春来，自古积成江海，同劳传同乐；

八百里平川，花开花落，如今安排河山，陆凉变陆良。 江科

责任编辑：陈诗珏

发扬“三牛”精神 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 段惠萍

决策出来之后，关键是抓落实，没有督查就没有落实。因此发扬“三牛”精神，对做好新阶段政务督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2021年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市内生产总值增长8.5%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以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控制在省下达目标以内。要完成这些目标，必须要狠抓落实，促使各相关部门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这就务必要加强督促检查。作为督查干部，我们应发扬“三牛”精神，以极端负责、极其用心、极为务实的态度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一、发扬孺子牛精神，以督促帮解难题

我国已踏上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曲靖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也开启了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逐步驶入了快车道，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但我们也面临着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重要时期等问题。要想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就要求我市全体干部职工要齐心协力狠抓工作落实。特别是我们督查干部更是要真抓实干，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心中的座右铭，带头当好为民服务孺子牛，以“比办家里的事情更为上心”的精神，紧紧围绕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确定的目标抓好督查

落实。进一步延伸督查服务指导职能，督帮结合，与被督查单位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共同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落实。比如，在开展稳增长、促投资督查中，针对项目入库难问题，曲靖市政府督查室就组建督办工作专班，在谋划项目和项目入库等关键时间节点，现场帮助指导各县（市、区）解决存在问题，项目入库率得到了大幅提高；在开展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督查中，对麒麟区提出的需要市直部门解决的问题，在对麒麟区相关工作进行督办的同时，就建设中土地报批问题反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既督又帮，促成了问题解决，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年，我们将对标对表细致研究既督又帮，围绕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要求，坚守“俯首为牛”的为民情怀，把群众路线落在脚下，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为增进曲靖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九牛拉不转的政治定力”动真碰硬，真督查实查，让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开花结果。

二、发扬拓荒牛精神，创新方式促落实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云南省重大历史使命。今年全国两会，王沪宁在3月7日参加云南省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云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在推动高质

作者简介：段惠萍，曲靖市人民政府督查室督查专员。

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强边稳边富边相统一。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对云南而言，这既是一种期待和鼓励，更是一种要求和任务。曲靖作为云南省的第二大城市，责无旁贷的要用铁肩膀担当硬任务，才能在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五抓”工作部署和“使劲跳起来摘桃子”的要求，抓发展就要抓产业，抓产业就要抓项目，市委、市政府结合曲靖实际提出以“四区五基地”建设为统揽，加快产业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抓经济的决策部署。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就是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我们督查干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创新督查方式，发扬“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进取精神，聚焦曲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像拓荒牛一样，保持一股“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勇于挑重担、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扛得下来。创新督查工作方式，秉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理念，着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在督查重心上，从只注重客观向主客观并重转变。督查中，改变以往的只看客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同时也要看在工作部署和组织落实中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否存在慵政、懒政，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的问题，主客观并重，找准问题根源，推动问题解决，抓好工作落实。二是在督查组织上，从市政府督查室单兵作战向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室联合督查开展转变。比如，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室联合对中心城区共享单车整治、城市供水、违规违法无序建房、党政干部食品安全责任落实等工作开展了督查，更好地优化了督查资源配置，提高了督查效能，推动了工作落实。三是在突出重点上，从见子打子的分散式随机式督查向统筹规划突重点抓关键转变，比如：去年创新性地组织开展的全市政府系统“落实见效”首次综合督查活动，自上而下确定出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7个方面范围，自下而上梳理出82项

督查任务清单，专广结合分别对督查组成员进行专业培训和系统培训，较好地提升督查能力和效率。集中时间、集中人员系统性的对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督查，这样既减轻了基层重复汇报重复陪同的负担，又理清了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的工作重点，让基层腾出时间来聚精会神抓产业、抓发展。这样不断探索督查工作的新路径、新方法、新举措，争做抓落实的行家里手，以坚决有力的措施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事情一件一件落实。

三、发扬老黄牛精神，无怨无悔作奉献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讲的就是一种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政府督查工作“重苦杂难”，要求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严实，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经常加班加点深入到一线督查，不仅自己辛苦，还无暇顾及家庭，没有奉献精神肯定是做不好的。只有像老黄牛一样爱岗敬业、任劳任怨、苦干实干，把为党和人民事业付出的“苦”化为自己的“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督查理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心用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切实解决党和政府政策在基层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督查中，不仅盯紧发改、财政、人社、住建、交通、农业农村、商务、文旅、卫健等重点部门的重要指标、重要事项和重点项目，对涉及群众的教育、医疗、社保、欠薪等单一事项也加大督查力度，做到抓大不放小，努力推动面上工作全落实，点上工作细落实。发扬钉钉子、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咬定目标锲而不舍推动工作落实，真正把抓督查促落实的成效体现在推动曲靖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上。并适时根据形势任务，突出督查重点、加大督查力度、创新督查方式，通过明查暗访、回访检查、督查调研、新闻督查等形式，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的方式，具体深入注重细节、抓住过程、盯紧末端，不厌其难、不厌其烦、不厌其碎地推动落实。 社科

责任编辑：韩 瑞

牢牢抓住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导思想

■ 蒋云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历史交汇点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工作报告、说明和重要讲话，总揽全局、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清晰展望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长期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了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就要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

一、以人民为中心谋篇布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重要判断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就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把“两个维护”融入血脉，化为自觉行动，要时刻对标对表向先进看齐，带头做“两个维护”的模范引领者、忠诚践行者、坚定捍卫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握一个根本原则。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工作中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问题，着重思考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正是在实践基础上凝聚人民力量，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在新的发展格局之下，曲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着力

作者简介：蒋云川，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

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和社会管理数字化应用，努力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围绕“两型三化”产业发展方向，按照全省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部署，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区域先进制造业中心，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二是围绕建设云南省第二中心城市目标，认真贯彻落实“滇中崛起”工作部署，全力推动“麒沾马”大城市建设，聚力推进城镇建设，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规划引领、龙头带动、多点联动、功能互补的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三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政治任务 and 底线任务，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国，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力解决历史遗留环境问题，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打响“大珠江源”绿色品牌，让绿色成为曲靖发展的底色。工作推进中，紧紧围绕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将政治方向、政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进、勇于担当、干事创业的心气、志气、豪气、锐气。

二、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世情、国情、省情、市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无论世界这个大格局怎么变，我们党员干部一切为了人民这个立场不能变，为人民服务这个方向不能变。“十三五”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沉着、保持定力，稳经济、促发展、战疫情、斗灾情、化危机、应变局，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国抓住难得机遇、顶住各种挑战、拓展发展新空间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越是在这种关键时期，我们越要主动作为，乘势而上，朝着党制定的目标奋勇前进。更加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曲靖的比较优势，深入研究“十四五”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定位和方向，统筹对内对外开放，努力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始终把改革作为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一招，作为推动发展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以改革的勇气和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解决好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需求问题，使全体人民更加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

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要解决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矛盾困难，又要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是关总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五个着力”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对曲靖“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进程中走在全省前列、建设麒沾马大城市和区域制造业中心”的发展定位，认清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使命责任，进一步深化对市情的认识，理清思路，找准工作突破口和切入点，抓住关键和要害，不折不扣把中央和省的各项决策部署与曲靖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为民爱民不扰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以人民为中心担当作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思想有多深，实践就能走多远。迈入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这三个“新”，当前，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曲靖正处于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传统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期，正处于收官“十三五”、谋

划“十四五”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一特殊关键时期，各项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曲靖经济社会发展能不能上水平、上台阶。我们要把这三个“新”作为推动曲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行动指南，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推动经济实现量的不断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十三五”收官在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在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已夺桂冠，党员干部要坚定信心，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认真深入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崇高追求，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制度机制，落实经常性查改违背初心使命问题的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推动曲靖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在前进道路上，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挑战，我们都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切实引领人民群众沿着党制定的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奋勇前进。**社科**

责任编辑：韩 瑞

谋划曲靖市“十四五”服务业发展新篇章

■ 刘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品进入大规模消费阶段后，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理念发展起来的新兴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较，现代服务业是新经济的体现者，具有信息化、国际化、规模化、品牌化等优势，体现出高成长、高增长、高科技知识含量和强辐射等产业特征，承担着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丰富产品作用，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对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三五”以来，曲靖市坚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全区服务业呈现稳步发展和升级发展态势，发展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曲靖市2019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94.90亿元，增长10.6%，拉动GDP增长4.4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0%，占GDP的比重达到45.3%。曲靖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中也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部署。可以预计，“十四五”时期曲靖市服务业增加值的规模和占比等总量指标再上一个新台阶，不难实现。真正的难点是，如何切实转换发展方式，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

服务业竞争力，以更加积极有效地发挥服务业的各种功能。

一、抓住曲靖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机遇

（一）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拉动力，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央的《建议》中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扩大内需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投资相比消费和外贸，乘数效应大，受疫情影响制约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有效投资增长必然带动消费市场拓展。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了巨大的内需潜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有力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二）城市群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试点，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四五”期间，

作者简介：刘颖，中共曲靖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副主任。

城市群将成为城镇化发展主导形态，目前我国城市群建设不成熟的问题将会逐步被解决，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逐步增强，城市之间的协调机制将逐步健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将进入成熟发展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将进入成熟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将进入快速发育期。随着曲靖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各项工作的推进，必将进一步深化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体制机制改革，为曲靖市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优化城市发展格局带来机遇，为商贸、物流、旅游、养老服务、文化服务等重点产业领域先行先试，创造了新动力。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中共曲靖市委 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麒沾马一体化建设发展的意见》中指出：“构建一体化城市经济体系。集中优势资源，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引擎为方向，着力提升城市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曲靖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形成高质量的城市经济体系。”曲靖市的城市经济体系核心区，将承载更多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功能，并在一体化发展中承载更多的购物、餐饮、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医疗卫生等生活性服务业功能。曲靖市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更好的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向核心区集聚，从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科学研判曲靖市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十三五”以来，曲靖市现代服务业体系基本形成，但以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大而不强，传统服务业的产值占整个第三产业的50%以上，但大多数商贸企业处于“小、散、弱、差”状态，经营方式落后，服务水平低，服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以金融保险、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房地产、信息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起步晚，发展还很不充分。会计、律师、公证、咨询、担保、产权交易、技术交易、资产评估、认证等中介服务组织规模小，服务水平低，远不能适应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二）服务业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区块特色尚不明确。曲靖市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缺少规模大、影响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大市场、大物流、大项目，服务业还没有形成集约化、园区化和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格局。曲靖市服务业多数行业布局分散，集中度不高，服务业的区块特色尚不明确，很难形成聚集效应，对曲靖市以外区域影响力小。现代服务业各功能区特色不够鲜明，现代城市服务业中所体现的中心城区综合服务、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贸）服务、旅游休闲、服务园区的生产性服务、创意产业等功能区没有在曲靖市体现出显著的特征。

（三）一、二、三产业之间未能形成良好互动。曲靖市受整个传统行业和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惯性影响，工业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不够。目前整个曲靖市工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难题，使得服务业发展需要的资金、人才、消费都不足。一、二、三产业链条短、关联度低、核心竞争力不强，难以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新兴第三产业如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商务服务

业、科技服务业发展滞后，对工业的转型升级支撑不足。

（四）现代服务业人才匮乏。曲靖市人才资源总量偏少、结构层次偏低，本地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与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相对应的掌握技术、管理的高端人才，以及领军人才、高素质复合型商务人才严重短缺。缺少带动引领金融保险、科技研发、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创新型服务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和团队。

三、谋划曲靖市“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

“十四五”期间，曲靖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居民高品质生活为导向，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走“两型三化”的产业发展新路子，充分发挥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坚持以加快服务业转型升级为主线，以建设服务业集聚区为主攻方向，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动力，实施服务业集聚化、品牌化、信息化战略，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商务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实现以提升消费业态和生活品质为重点，不断提升城市承载力、竞争力和吸引力。

（一）优化发展支柱型服务业。以服务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为导向，以提升消费业态和生活品质为重点，不断提升城市承载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可确定“十四五”期间曲靖市现代服务业的支柱型产业为商贸服务业、文化旅游业、金融服务业。

1. 商贸服务业。“十四五”期间曲靖市应大力发展以新零售为引领的商贸新业态、新模式，大力

推广时尚消费、夜间消费、假日消费、休闲消费和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方式。深入实施商贸转型升级发展战略，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商业业态创新，积极培育新消费新供给，构建差异化、特色化、便利化的现代商贸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商贸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构建特色明显、充满活力的现代商贸业发展新格局。

2. 文化旅游业。充分挖掘曲靖市城乡经济资源，创新发展模式，优化发展布局，重点规划和打造体现曲靖城市特色、城市品牌和乡村旅游的经济载体，进一步推动商业设施、旅游景区、特色旅游村镇、生态绿色景观带、特色文化街区、城市绿廊夜景“点、线、面”相结合。把曲靖市建设成为传统山水观光与时尚休闲康体品牌突出，人文风情浓郁、接待设施完善、服务质量过硬、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3. 金融服务业。围绕改善金融发展环境，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经济金融共生共荣、和谐发展，通过加强政银企合作，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严厉打击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解决制约金融机构发展的阻碍和困难问题，提高为金融服务的水平，打造良好金融生态，不断增强金融机构的自我发展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为曲靖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大力支持成长型服务业。依托现代高新技术，通过服务业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催生新产业，创造新需求，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商务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可确定“十四五”期间曲靖市现代服务业的成长型产业为现代物流业、商务服务业、电子商务。

1.现代物流业。科学规划物流通道和物流发展区域，合理设置物流节点和物流园区，优化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总体空间布局，促进交通与物流融合发展，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总成本。强化物流园区对物流节点的支撑作用，根据现代物流产业空间布局，采取整合或新建等方式，在曲靖市内主要物流节点及其辐射区域内规划建设一批重点物流产业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2.商务服务业。以提升曲靖市高端商务服务水平为着力点，围绕促进商务服务规范化、高端化、集聚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突出发展财务类、法律类、咨询类、中介类和会展经济、总部经济等商务服务业，积极推进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在商务服务各领域的融合应用，创新商务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商务服务层次和水平。促进商务服务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完善，使曲靖成为云南省商务服务业的领先城市。

3.电子商务业。鼓励制造业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优化采购、分销体系，推动建设一批行业电商平台。打造在线金融、在线旅游、在线文化教育、在线医疗健康和在线生活服务平台。创建一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智慧社区消费平台，加强移动电商多领域应用，全面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搭建“工业品下乡入村、农产品进城入市”的双向流通网络。加快完善网络支付、企业认证、网络信息安全配套服务体系。积极对接国家“网上丝绸之路”，对接国家级和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西部跨境电商基地等跨境电商示范园区。

（三）加快发展创新型服务业。以支持新型工业化强市目标为导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着力点，为全市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撑；充

分利用全国宜居城市的品牌效应，紧抓高原体育城市建设契机，挖掘医疗、保健、养老等资源优势，“十四五”期间曲靖市可将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康养服务业作为创新型产业进行培养。

1.科技服务业。培育壮大科技服务市场主体，全面整合、有效配置各类科技服务资源，增强科技研发和设计及转化服务能力，培育创新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商务性科技服务企业，全面构建功能完备、运行高效、开放协作的现代科技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2.信息服务业。以智慧城市建设为着力点，积极引导三大通讯运营商加快5G应用基础设施布局，推动信息服务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重点发展面向先进制造业的资讯服务、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外包等信息服务业，积极培育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信息服务业。

3.康养服务业。结合城市品牌，招商引资，积极建设示范性医养结合机构、文化和养老小镇、田园和健康养老服务综合体，推动形成“候鸟式”养老群落和健康养老产业集聚区，加快建设全国养老服务产业基地和健康养老胜地、体育康养、休闲康养名城。

“十四五”时期，曲靖市抓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机遇，积极补齐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短板，科学谋划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必将促进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社科**

责任编辑：陈诗珏

以绿色能源牌为引领 构建现代化光伏产业体系

■ 陈小琴 胡向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将绿色能源产业作为培育八大“千亿级优势产业”之首，要确保率先取得突破。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将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全面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明确了2021年“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持续巩固和扩大清洁能源优势，优化供电结构，深入推进绿色能源战略与绿色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奋斗目标。绿色能源是云南省的优势产业和重点发展产业。“十四五”时期，绿色能源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曲靖市绿色能源发展成果丰硕

近年来，曲靖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的部署安排，依托良好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着力引进一批绿

色铝、绿色硅重大项目落地投产，推动绿色铝材、绿色硅材一体化发展，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产业集群化发展道路。曲靖市在经开区南海子工业园区规划了面积1.04万亩的绿色水电硅产业园，依托云南丰富的绿色水电和硅材料产业发展基础，紧盯硅晶新材料产业规模化、集群化的目标，重点发展单晶硅拉棒及切片、电池片、组件等产业。目前国家级曲靖经开区成功吸引了全球五大光伏企业中的隆基股份、晶澳太阳能、锦州阳光三家龙头企业落户，在曲靖经开区已投产、在建及已签约项目硅棒及切片产能已达到60GW，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00亿元以上，光伏产业发展已呈现出较好的集聚态势。“十四五”时期，推动以绿色能源为主要特征的能源高质量发展将是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路子、建成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主要发力点。曲靖市将全力打响“绿色能源牌”，持续推进绿色能源战略与绿色先进制

作者简介：陈小琴，曲靖市社科联编辑部主任；
胡向华，全球技术广播电视台。

造业深度融合，以工业园区为平台，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依托“硅晶产业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硅化工产业园”，全力发展光伏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硅化工产业集群，着力构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一流硅精深加工产业基地，打造世界“光伏之都”。合理发展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加大中缅天然气利用力度，将曲靖打造成为云南省重要的通用管道天然气枢纽中心、云南省乃至西南重要的新能源基地。

二、曲靖市多措并举抓实绿色能源产业

（一）抢抓机遇，坚持产业集群化发展道路，做好“绿色文章”。曲靖抢抓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在云南交汇叠加和全球产业梯度转移、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等难得机遇，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围绕育链、延链、补链、强链招商，补齐短板，在国内建立完整的硅光伏产业链生产供应体系，实现国内自循环，减少对国际相关产品的依赖，做好“绿色文章”。紧紧围绕硅片（拉晶及切片）、电池片下游产业，依托现有资源和产业基础，加快完善“硅料—切片—电池片—组件—应用系统”光伏全产业链，精准锁定招商方向，细化完善多晶硅及光伏产业分布图、产业链全景图、生态发展路径图、重点企业和配套企业名录表“三图一表”，对内作为发展指南，对外作为招商指南。上游通过政府引导光伏企业合资参股等方式发展多晶硅产业；下游重点在电池组件、光膜、光伏玻璃、应用系统等领域头部企业招商引资上下功夫，采用以商招商、中介招商等方式，加大精准招商力度，充分发挥园区主导产业招商专班的作用，引进一批带动力强的光伏配

套企业、打通全产业链布局。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紧跟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创新进取、主动作为，聚焦在产业链中居于关键性地位的龙头企业，精准招商、重点扶持，着力引进动力电池、光伏储能等新能源企业，打造光伏、化工、新能源电池产业闭环。

（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步伐，推动形成规模效应。探索各类开发区合作共赢发展，为打造光伏产业链提供容量支撑。目前与曲靖经开区相邻的20公里半小时经济圈中的沾益花山片区和麒麟越州片区已经获批省级化工园区，这两个片区环境容量和可开发用地较丰富，曲靖市积极探索片区综合开发模式，加快完善规划区内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提升园区对硅光伏产业的承载力，形成经开区园区龙头带动、麒麟、沾益片区联动发展的全产业链互动融合发展模式。积极培育园区产业生态，适度超前建设一批孵化器、标准厂房、员工宿舍、写字楼，配套完善商务、金融、物流、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大力推进园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把园区打造成为创新高地、开放高地、人才高地。

（三）强化政策支撑，增强投资吸引力。围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燃气直供气试点、供排水第三方服务等改革，鼓励区内企业与发电企业直接进行电力交易，全力降低光伏企业能源资源成本。加快光伏产业发展基金组建工作，对光伏产业项目实行精准扶持。根据企业需求，立足本地比较优势，创新政策举措，提高招商竞争力，提升对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实施与省内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人才定向培养工程，重点加

强研发型、技术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强化光伏产业人才支撑，对引进的各类高层次人才提供出入境、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创业投资等“一站式”服务。对曲靖国家级经开区引进的外籍光伏产业高层次人才，提供签证、居留许可和永久居留服务便利。对光伏企业急需的外国专业人才，按照规定适当放宽申请工作许可的年龄、学历和工作经历等限制。

（四）强化服务意识，优化营商环境。在项目落地方面，曲靖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了企业联络员等“三项制度”。认真贯彻《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实施意见》精神，精简硅光伏投资项目准入手续。在总结曲靖经开区“一站式”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先建后验管理模式，推行重大项目领办制、代办制的基础上，探索开通“容缺审批绿色通道”，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事项清单管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不见面+上门服务”审批，对审批事项缺少非核心要件前置条件的，可实行“容缺后补”，进一步强化曲靖国家级经开区与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的联动效应，加大开放力度为硅光伏产品开展外贸提供便利。

（五）支持创新发展，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加强政策研究，推动光伏产业迈向新高端，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支持发展联通光伏产业上下游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产业生态系统的光伏产业项目，加速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加强高级技术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的支持，逐步建

立起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认证中心，建立光伏企业技术服务平台，重点解决光伏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 and 关键性问题，促进光伏产业从最初的选材到整个产业链的系统中的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加快组建曲靖光伏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协会联盟，积极推动筹建省级光伏产业研究院，争创国家级光伏产业发展技术研究院。完善标准体系，针对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的实际，解决我国光伏产业在国际上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三、曲靖市“十四五”绿色能源前景广阔

“十四五”期间，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承诺的持续推进，以及全球性能源革命的驱动，光伏等清洁能源已到全球性能源替代的时代。同时也对绿色能源技术革命，尤其是在水电、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曲靖将依托绿色能源资源优势，找准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按照产业集群发展思路，推进绿色能源战略与绿色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壮大绿色硅、新能源等产业集群，及时引导硅光伏产业发展，努力成为“大循环、双循环”的战略连接点和重要支撑点，打造区域先进制造业中心和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将曲靖建成世界“光伏之都”。曲靖现有多家龙头企业，应关注参与光伏产业的标准建设，结合产业实际水平，建设完善的硅片、太阳能电池和其他产品及光伏系统相关标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在部分领域成为先进制造业节点，为后续标准化生产做好充足准备。 **社科**

责任编辑：张 兵

供销合作社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中共曲靖市委党校课题组

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靠统购统销承担了中国几亿农民买与卖的任务。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供销社是人们购买生产生活用品、进行信息交流、传递情感互助离不开的地方。当时，供销社是每个村里最大的综合商店，以为农民服务为宗旨，全面供应各类农民生产资料、销售各种农副产品、供应基本生活用品等。长长的柜台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这里有大人劳作需要的农具、种子、化肥，有生活必需的茶米油盐酱醋；有令小孩子眼馋的水果糖、玩具、文具、小人书、新衣服……那时，一个村、一个乡镇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一定是供销社，人们常常聚在这里买东西、拉家常、看电视。对于在农村生活的广大农民群众而言，供销社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和谐的需求，是人们向往的地方。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阀门打开，各类商贩、商店门市纷纷涌现，供销社不再是过往的那个“唯一”，农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供销社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这在供销社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再次对供销社综合改革提出要求，指出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党和政府做好“三农”工作

的重要载体。供销合作社要把为农服务放在首位，推动供销合作社由流通服务向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加快形成综合性、规模化、可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发展阶段落实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现阶段已被纳入至国家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销合作社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发挥其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近些年来，供销社在深化改革中不断调整定位，加强基层社建设，全面对接市场，开始逐步恢复振兴，逐步发展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主力军，在“三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在助推产业振兴方面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工作生活，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形成的劳动力转移，导致了农村土地大片闲置及劳作人员老龄化，“谁来进行生产复耕”成为了突出的问题。当前，依托供销社，通过托管方式，组织合作社，可以有效破解“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难题。如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积极开展土地托管服务，通过专业社与农民签订土地托管合同，为农民提供耕、种、管、收、加、贮、销的“保姆式”“菜单式”服务。外

作者简介：徐永光，中共曲靖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方琳，中共曲靖市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
丁源，中共曲靖市委党校教师。

出务工者，借助供销合作社的土地托管服务，农村群众就能做完耕地播种、浇水施肥、庄稼收割等农活，科学有效地进行种植管理。经过供销社托管的土地，亩均节省化肥用量2至3公斤，收入增加50至150元，既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又避免了土地流转中的“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农民实现了打工种地“两不误、同增收”，既进得了城，又留得住根。

四川省崇州市供销社积极开展以代耕、代种、代管、代收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土地托管”，有效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问题。通过优化水稻品种、优化服务流程、建立区域农机协作服务平台，既为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提供优质的全程高效的农业生产服务，又为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者提供了最便捷的全产业链服务，实现了粮食生产“优质、安全、高效”。

小而散的农户对于农业农村的产业规划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不甚了解，抓不住市场的手。而供销社在改革浪潮中重新精准定位，实施调整，能够较好地掌握市场端，以产定调、以市场定调。供销社的触角深入农村，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消费的市场需求。可以说，千家万户的小作坊如何应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依靠的就是供销社。“基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依托农合联和惠农综合服务中心的资源优势，通过参与构建农业现代化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流通体系，健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实现小农户与大农业的有效对接。”

与此同时，农村养老问题突出，年轻一代均外出打工，剩下老年人和妇女儿童留守，家中缺乏青壮年劳动力，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步萎缩，老年人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无力解决，而社会养老服务功能还较为薄弱，不能有效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供销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天然的优势如系统品牌、网络、保障资源优势等，注定了其在自主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社

下属大通集团公司与中国供销集团下属企业联合组建中合养老（绍兴）股份有限公司，开启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试点工程，计划通过“医养结合、综合服务”模式，承接全区“镇、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为城乡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专业优质的养老服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二、在解决村集体经济收入方面

实践证明，村、社区没有集体收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地位。只有强大的集体经济作为后盾，乡村振兴才有强劲的基石作为支撑。当前，我国集体经济薄弱村量大面广，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没有经营性收入的村占50%，经营性收入不到5万的占30%。

川南地区供销合作社大力探索新型基层社的改造重组和创新发展，广泛吸纳村集体经济组织、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两委”负责人、农村能人等入社，整合区域资源，重构服务网络，在组织架构、治理机制、服务功能等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基层社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更加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加完备、市场化运行更加高效。如泸州市泸县供销合作社以产权为连接、以业务为纽带，按照“供销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型组织结构，形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2017年以来，完成了7个镇级新型基层社和1个村级供销合作社的重建重组。如云锦镇基层社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县供销合作社控股51%、18家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改制后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参股9%、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股0.45%，其他55个家庭农场、农村经纪人、种养大户、村社干部和涉农企业参股39.55%。云锦镇基层社的股权结构，既体现了供销合作社的农民主体地位，也适应了市场经济对经济组织运行机制的客观要求。

山东等地供销社推进基层供销社与村集体开展“村社共建”，通过共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共上特色产业项目、共建综合服务社等，实现了农民增收、村

集体壮大、供销社增效的多方共赢。嘉祥县梁宝寺镇供销社引导南孔村委及81户村民，合作共建了济宁市第一家以农民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建立“股权保底收益+股权盈余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的新模式。

曲靖全市的食盐统一销售与管理，由供销社定制，交由村、社区代理，盈利的40%用于解决村干部待遇低的问题，60%用于解决村集体收入问题。同时，可以拓展农资、农药、种子等业务，依托价格优势、品质优势，更进一步壮大村集体收入，村、社区干部收入也将得到保障。

三、在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方面

乡村振兴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当前农村环境问题较为严峻，白色垃圾、废弃农膜、旧家具家电、废弃电池不知如何摆放，生产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现象突出，农业面源污染严重。从目前来看，供销社的职能主要涉及农资、农产品、生活日用品以及再生资源回收等方面。全国供销社系统农资经营量占全社会70%，再生资源回收量占全社会50%，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力量。

江苏省供销社在全系统做到再生资源百分百回收。作为农药的代销点，供销社均在农药瓶和袋子上编上编号，按时回收，对此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助。相反，对于没有完成回收任务的，则给予相应的处罚。供销社庞大的体系市场，决定了其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便捷便利。

山东省嘉祥县梁宝寺镇供销社主导成立的南孔土地股份合作社，由梁宝寺为农服务中心负责托管经营，大力推进绿色产业基地建设，配备了农用植保无人机等高端自动化机械化设备，以高效率、高精度、高环保的操作方式替代传统农业耕植方式，采用土壤熏蒸、深耕疏松、种肥同播、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无人机植保、烘干收储和秸秆还田等现代农业新技术、新手段，全面提升了绿色环保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应用程度。

通过实施“沃土工程”有效培育了地力，通过实施“精准施肥用药工程”实现了化肥农药使用量的有效减少，通过实施粮食烘干收储有效降低了粮食霉变率和晾晒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在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效益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四、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

供销社有2300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6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开展产业扶贫、提高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具有天然的独特优势。譬如可积极吸纳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提高贫困户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调动系统科研院所、职业院校等多方力量，加强科技和就业培训服务，为贫困地区提供人才支撑。

如曲靖市供销社推行“供销社+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村‘三委’+基地联贫困户”的食用菌产业发展模式，全市食用菌产业实现产量18万吨，产值19亿元。通过成立曲靖功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搭建全市消费扶贫平台，实现贫困地区农特产品销售额404.5万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00余人增收。

四川省崇州市供销社围绕如何把“崇州产”农产品卖出去、卖得好，积极参与引领全市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在坚持“政府主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原则下，崇州市供销社组建了电子商务公司，参与创建了“西蜀粮仓”“天府农特网”“土而奇”“宫保府”等电商服务平台，引领全市各类涉农企业、种养殖大户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依托供销e家、京东、淘宝、天虎云商等电商平台开展崇州农产品推广销售。

未来，供销社可通过加大项目建设，培育扶持龙头企业，充分发挥物流、流通领域方面的作用，通过吸纳入股、就地就近就业等方式，结成利益联盟，进一步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社科

责任编辑：邱俊翔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思考

■ 陈玉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是顺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新要求。“十三五”以来，全市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任务，举全市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82.7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20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个贫困县高质量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同时，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编制实施了《曲靖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曲靖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方案（2019—2022年）》，乡村振兴取得良好开局。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面临的挑战

202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这是党中央在面对脱贫攻坚取得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时的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从曲靖的情况看，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

（一）持续增收的稳定性问题。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就业、产业。从转移就业看，全市外出务工就业基数大，常年在外务工200万人左右，其中建档立卡人口达35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很大，一方面说明全市劳务输出工作成效显著，另一方面，基数大，依赖性也大，受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也会变大。从产业发展看，扶贫产业不同程度存在同质化、与市场匹配度不高、对政策依赖程度深等问题，辐射带动作用受限。

（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问题。全市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近20万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人

作者简介：陈玉森，中共曲靖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口能融入、有就业、逐步能致富任务十分艰巨。在融入方面，部分群众缺少归属感和融入感，思想不稳定，安置区社区治理还要加强；搬迁区硬件设施建设较好，但公共服务等还要加强。在就业方面，扶贫车间规模小、覆盖面小；公益岗位安置就业多，财政支出压力大。在致富方面，部分搬迁区产业规模较小，发展相对薄弱，需要长期培育扶持。

（三）群众发展致富内生动力问题。大多数低收入群众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缺乏专项技能，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对依靠自身能力增收致富的信心不足。脱贫群众思想贫困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有的脱贫群众担心最多的是扶持政策会不会变，而不是考虑今后如何发展致富。

（四）理清衔接思路的问题。虽然乡村振兴战略已实施三年，但在实践中如何将脱贫攻坚所累积的经验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如何利用乡村振兴战略所提供的政策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还没有清晰而成熟的思路和做法。尽管一些地方积极开展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促进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如罗平县旧屋基乡以民族、生态、扶贫、旅游、党建“五张牌”为抓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中药材种植、中蜂养殖、土鸡养殖等产业，强化乡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明显成效。但整体而言，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仍然缺乏系统性认识，存在就巩固谈巩固，就振兴谈振兴，二者相互割裂的现象，实践探索呈现零散化，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还不多。

二、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几点思考

就当前如何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聚焦工作目标。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重点和目标应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人”的层面。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就是要紧盯低收入群体，重点是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以及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的群众，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防止返贫致贫，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二是“策”的层面。就是要巩固脱贫攻坚期行之有效、可持续发挥作用并延续使用的政策措施，即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当前，应通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规划或实施意见，明确过渡期内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的有效衔接。特别是在政策举措方面，在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应分类明确哪些政策继续保持稳定，哪些政策需要优化调整，科学确定优化调整的范围、内容和时限，既提高政策针对性，利于脱贫成果巩固，又拓展政策包容性，增强政策的普惠性和效率性，利于有效衔接。

（二）把握工作节奏。推动乡村振兴，既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突出矛盾的迫切需要，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认识到，虽然全市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有所缓解，但发展不平衡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乡村振兴必然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问题。因此，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应立足于实际，不好高骛远、急功近利。要坚持因地制宜，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做到科学规划、分步实施、注重质量、有序推进，防止急于求

成脱离实际的目标。

（三）提振干部群众精气神。从干部来看，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广大党员干部长年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了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通过脱贫攻坚，培训和造就了一大批懂“三农”、热爱“三农”的干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积累了宝贵财富。但是，这些年一仗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弦绷得很紧。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应进一步完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机制，优化考核程序，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同时，强化考核结果应用，采取多元化激励措施，鼓励干部树立接续奋斗的勇气和使命担当。从群众来看，要防止一部分人实现脱贫后，小富即安，不思发展，形成“福利依赖”。同时，要关注一部分群众特别是边缘户，因没有享受到扶持政策而产生不满，影响政策在基层的落实。要按照省委的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建救助平台、建产业帮扶全覆盖机制、建壮大村集体经济帮扶机制、建扶志扶智机制”四个专项行动。一方面，通过救助、产业帮扶、集体经济、培训就业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有效防范政策享受方面的“悬崖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完善扶志扶智机制，加强对农村低收入人口思想帮扶，以“爱心超市”等正向激励措施，营造崇尚劳动、勤劳光荣的良好氛围，以“红黑榜”等形式扬正气、促后进，以政策优化对反面典型予以实质性惩戒，防止政策养懒汉。

（四）分清职责任务。脱贫攻坚以来，全市构筑了市、县、乡、村、组“五级联动”作战责任体系，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保障作用。要借鉴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制度

保障，研究出台责任落实等方面的实施细则。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作出了一些探索，如有的地方实行“乡村振兴责任清单制”，分别厘出了县、乡（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责任清单。县级包括履行全县乡村振兴第一责任人，着力研究解决“人、地、钱”等乡村振兴关键问题，把“一懂两爱”的优秀干部充实到“三农”战线等。乡（镇）包括指导帮助村党组织谋划乡村振兴各类项目，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村（社区）包括全面落实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等。这些经验做法值得借鉴，但也不能照搬照套或搞一刀切，各地应立足实际，立足激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活力和动力进行探索。

（五）抢抓政策机遇。《建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隐含着许多政策机遇。如《建议》提出，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其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全市应抢抓政策机遇，以实施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乡村振兴示范园创建、脱贫出列村提升行动为契机，勇于创新、大胆探索，发挥优势、形成特色，为争取国家和省的支持打牢基础。又如《建议》中提出，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我们要以跳出曲靖，放眼全国的视野，巩固在脱贫攻坚中与上海市宝山区及江苏省有关企业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产业转移、劳务输出、人才培养、消费扶贫等方面拓展合作领域，借助发达地区的优势，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助推乡村振兴。**社科**

责任编辑：韩 瑞

升级换代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选择的 核心要件

——以宣威市普立乡为分析对象

■ 高满良

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创新发展，优化城乡社会结构的新业态。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为活动场所，以乡村自然生态景观、聚落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绿色农产品等资源为依托，以旅游设施为条件，以休闲为主要目的，为城市居民或旅游者提供休息、娱乐、观光、旅游、体验的经济活动。在乡村旅游升级换代的背景下，结合乡村特有的资源优势，选择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并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支持体系，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乡村旅游升级换代的客观必然性

（一）消费需求的变动推动乡村旅游升级换代

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那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场景式旅游已经不再受人们的青睐，个性化和乡土性的旅游需求越来越受到城市居民的欢迎，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乡村旅游正是想获得一种“回到乡野，亲近自然，倾听乡音，感受乡愁”的消费体验。因

此，目前国内所说的乡村旅游是指现代乡村旅游，是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但是，当前乡村旅游无论在产品开发、服务水平亦或在发展模式方面都与旅客的消费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乡村旅游无法让城市游客有诗意地回到乡村，乡村旅游升级换代是消费需求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推动乡村旅游升级换代

“十三五”以来，国家把乡村旅游扶贫纳入国家十大扶贫开发工程，并在制度和经济投入层面给予乡村较大的支持和倾斜，推动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乡村旅游在空间上和业态上的根本性转变，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政策措施的逐渐完善迫切需要实现乡村旅游“点、线、面”有机结合的空间分布及旅游产品的创造性开发，在农村营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孵化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乡村旅游档次低、类型单一，迫切需要

作者简介：高满良，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升级换代

尽管广袤的乡村存在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几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也逐渐加大乡村旅游的扶持和开发力度，但受限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及地方经济基础发展的薄弱，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仍旧以观光、游览、休闲等传统方式和大众消费品为主，“吃吃农家饭，住住农家房”，仍然是旅游产品的主攻方向，缺乏乡土文化的创造性培育和创新性转化，总体上缺乏独特性和排他性，很难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面”旅游精品，实现乡村旅游升级换代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普立乡旅游资源的现状及优势

普立乡位于宣威市东北部，云贵两省交界处，国土面积170.2平方公里，辖普立、阿基卡、迤兴、鹤谷、腊龙、戈特、老厂、簸火、攀枝嘎、官寨、更底、格学、卡乌13个行政村，174个自然村。全境山高谷深，山川河流纵横交错，众多悬崖绝壁，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悬崖峭壁上生长着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金雕等，全乡有大量的岩溶洞、瀑布群、石潭、壁画等自然奇观，是不可多得的旅游探险圣地。

（一）自然景观

普立乡生态环境优良，山川秀丽，自然景观丰富、景点繁多，目前最具有开发价值的自然景观有尼珠河大峡谷和普立睡佛等。

尼珠河大峡谷是北盘江上的一条支流，北起普立乡更底村，南至普立乡腊龙村，途径官寨、攀枝嘎、簸火、戈特4个村委会，盘旋萦回的金雕、光怪陆离的溶洞、倒挂依壁的老树、色彩斑斓的悬崖峭壁、飞泻百米的雌雄双瀑、千奇百怪的牛肝马肺、佛光普照的千年菩提、悠远深长的两岸猿声、躺满一河的亿万奇石成为尼珠河大峡谷中独有的景观。尼珠河大峡谷于2015年荣获“云南十大特色旅

游新地标”称号。

普立睡佛位于簸火与戈特两个村委会的交界处，在北盘江第一高桥的西岸，睡佛有着高高的发髻，五官清晰逼真，形象深邃，饱含哲思，双眼微闭，睫毛浓密整齐，鼻梁直挺，嘴唇微张，两唇丰腴，上唇微翘，下颌圆润，面容安详，仿佛置身于天地间，沟通天与地，带着造福百姓的使命安居于此，不慌不忙的神情展现出的是百姓安居乐业，盛世太平。

（二）人文景观

在改造自然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普立乡同样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人类文明成果的人文景观，目前最具有开发价值的人文景观有攀枝嘎农业学大寨遗址、簸火梯田、北盘江第一大桥和普立大桥等。

攀枝嘎农业学大寨遗址位于攀枝村委会，遗址由第二招待所、礼堂、大寨地组成。招待所坐南朝北，面阔7间29.4米，进深10.15米，为三层木结构建筑。礼堂坐西朝东，面阔19.4米，进深11.9米，为单层木结构建筑。南面设有宽约5.8米，高0.71米的半圆形主席台，可容纳观众400余人。大寨地位于村委会周围的山上，总面积850亩，始建于1969年，是攀枝嘎村全体党员群众以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前后经过4年艰苦奋斗，劈开11个山头，填平3条大沟，在海拔1600米到2400米的悬岩陡壁上，凿通一条25华里的盘山公路，在乱石滚滚的大沙河下，筑起了27道防洪淤沙石坝，垒砌了2350多条石埂。“大寨地”的建成，使“山高谷深坡陡，人多地少难耕”的攀枝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村粮食总产量翻番，经济收入增长83%，成为当时云南省乃至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后来逐渐演绎发展，形成了红遍全省的“攀枝嘎精神”，改革开放以前，从政府领导到一般群众，前来参观学习

的人络绎不绝。

簸火梯田位于簸火村，背靠老厂村狮子峰，面临尼珠河大峡谷，梯田总面积约3000亩。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簸火梯田开垦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簸火梯田是喜欢田园风光，爱好徒步旅游及摄影者的最佳去处。

北盘江第一大桥位于普立乡腊龙村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都格乡交界的尼珠河大峡谷上，是目前世界上跨径最大的钢桁梁斜拉桥，同时也是G56杭瑞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该桥全长1341.4米，主跨720米，以564米的垂直高度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高桥，同时还以720米的主跨成为世界上主跨最长的连续钢桁梁斜拉桥。

普立大桥是G56杭瑞高速云南境内首段三座特大桥之一，横跨普立大峡谷，是普宣（普立至宣威）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普立大桥是主桥设计为单跨628m（全长1040米）的钢箱梁悬索桥，由53节长12米，宽28.5米，高3米，重146吨的箱体组成，塔高153.5米，峡谷谷底距主塔顶达653.5米，不仅是世界最高的悬索桥，而且是各种桥梁中桥面最高的桥，桥面超出普立大峡谷500米，它的建成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令人震撼。两座特大桥的建成真实的展现了我国交通桥梁建设的技术成就，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三）产业基础

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普立乡党委政府抢抓上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政策机遇和普宣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带来的发展机遇，提出“生态旅游之乡、特色产业之乡”的发展新目标，大力推进“五个一批”产业新布局：即“一幅画”（以尼珠河为代表的旅游业）、“一棵树”（以紫荆、土漆为代表的特色林果业）、“一瓶酒”（以

普立小甄酒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业）、“一只羊”（以不回家的羊为代表的特色养殖业）、“一株草”（以草乌、独定子、铁皮石斛为主的中药材种植业），努力把旅游产业培育成全乡经济发展的远景支撑点。

三、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选择及核心要件

具备了一定的资源优势，并不能确保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选择一种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把自身的资源优势与旅客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发展模式的科学定位：建成什么类型的乡村旅游

发展模式的科学定位就是要建设成什么类型的乡村旅游的问题。发展模式的选择决定着乡村旅游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也决定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及其发展的结果。依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进行不同的区分和归类，目前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被大众所认可的分类。有研究者把乡村旅游划分为规范化的景区服务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休闲化的郊野休憩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度假化的文化发展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和产业化的农业公园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这几种类型的划分基本上可以覆盖当前乡村旅游的基本业态。事实上，依据不同乡村所具有的旅游资源及游客需求的变化，从具体操作层面，可以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综合型、交叉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从普立乡的旅游资源看，可以依托尼珠河大峡谷、睡佛、簸火梯田发展休闲化的郊野休憩型乡村旅游，依托农业学大寨——攀枝嘎遗址发展产业化的农业公园型乡村旅游，在村级层面重点看“点”，多个点的基础上村和村之间就会形成“线”，而整个乡就会产生“面”的综合效应。

（二）产品业态的合理构建：开发什么样的旅

游产品

无论何种发展模式，乡村旅游都必须获得相应的业态支撑，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产品业态的合理构建就是要通过合理的产品开发来支撑相应的旅游发展模式。随着旅游者需求层次、旅游质量和生活品位的提升，单一的旅游产品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体现出多业融合的特点，本着发现特色，培育特色，放大特色的基本思路，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通过创新产品营销方式，形成集体体验、观光、娱乐、度假、购物等于一体的产业链现多产融合升级，打造“乡村旅游+”。从调查点普立乡的产业基础看，结合“五个一批”产业发展布局，如尼珠河大峡谷申报国家地质公园获得成功，将会带动农、林、牧业的全面发展，围绕农业可以考虑规划高原特色农产品的电商研发和销售，农业生产体验型、农业科普教育型等山水田园休闲产品，围绕牧业可以考虑特色美食养生宴及相应的高端农副产品，围绕林业可以考虑把尼珠河大峡谷建成生态科研基地，徒步旅游和山地探险基地，建设“森林氧吧”、开展森林娱乐活动、开发特色工艺品等。

（三）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培育什么样的文化精品

旅游产业中的文化挖掘比其他产业显得更为重要，城市游客之所以会选择回到乡村，选择的是一种生活体验而非满足生活刚需的某种功能。因此，乡村旅游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必须进行深度的文化挖掘。乡村旅游应在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和整理乡村文化的基本构成，复活（恢复）乡村的文化记忆，形成乡村文化符号，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打造被村民认可和熟悉、旅客能够感知的独特文化

品牌。从普立乡的文化景观看，可以通过对攀枝嘎农业学大寨遗址、簸火梯田进行修复和保护的基础上，实行创造性开发，引导旅客欣赏农田风光，观看农业生产以及务农体验，感受农耕文化，体悟群体性文化遗产，既可以开发成体验文化也可以开发成教育文化。同时，通过现场的巧妙介入和旅游路线的合理设计，引导游客了解和熟悉普立乡境内两座世界级的特大桥的建设过程和建设成就，让旅客形成标志性的乡村记忆工程，这既有利于旅游产品的宣传和推广，也有利益于提升乡村旅游的质量和水平。

（四）自然生态的有效保护和持续修复：形成什么样的乡土风光

乡村旅游无论怎么规划和发展，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态资源都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随着乡村旅游开发的持续推进，自在自然必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类的开发行为必然对自然风光和生态资源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没有打上人类实践烙印的自然风光和生态本底往往无法很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诸如存在出行或观景的不便，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天然阻隔。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实现自然生态的有效保护和持续修复的平衡就显得弥足珍贵。从普立乡的自然生态环境看，因为点多面广，山高谷深，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更需要持续推进。首先必须划定自然生态保护和开发的区域和点线，确保具有开发价值的自然生态不至于受到破坏。同时要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和规则，就自然生态的保护区域、保护对象、保护方式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要求。最后，要加快开发区基础设施和景观廊道建设力度，满足旅客的实际需求，确保旅客的人身安全。■社科

责任编辑：邱俊翔

繁荣发展民族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曲靖市民族文化工作调研组

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巩固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总结曲靖市民族文化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做好“十四五”期间民族文化工作的谋划。2020年，曲靖市民宗委组织部分专家深入到各县（市、区）部分民族乡、民族村寨和民族学校，就曲靖市民族文化工作开展情况、省级民族文化项目实施情况、民族村寨的建设情况开展调研。

一、基本情况

（一）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

曲靖市有彝、回、苗、壮、布依、水、瑶7种世居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8个民族乡、161个民族村委会和1479个民族自然村。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语言文字丰富多样、风俗习惯各具特色、节日节庆种类繁多等特点鲜明、生机勃勃的民族文化。根据2017年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基本情况联合开展摸底调查，共梳理出全市7个世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物、古籍、音乐、乐器、舞蹈、民间工艺、建筑、服饰、仪式、节庆、民间文学、传统体育、医药等方面15个类别、657项传统文化，初步形成了曲靖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数据库。全市各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民族民俗

文化背景，融历史文化、乡村文化、节庆文化、生态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于一身，构成了曲靖市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体系，为曲靖市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立体、丰富的文化基础。

（二）加大资金投入，开展文化项目建设

为更好地推进曲靖市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曲靖市民宗委加大对民族文化建设资金的投入，支持民族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并积极推动相关文化项目的建设，为实现曲靖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创造条件。通过资金的投入，大力支持和推动文化建设项目地开展，不断实现文化的发展，相关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生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品，建成了一批民族文化小广场、传习所和民俗博物馆，为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曲靖市民族文化建设的成效

曲靖市民宗委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工作，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得到继承与保护，增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

（一）文化富民效果凸显，助力脱贫攻坚

作者简介：王 芳，曲靖市民宗委副主任；

朱海燕，曲靖师院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

李忠莉，曲靖市民宗委文化教育科科长；

金妮圆，曲靖市民宗委文化教育科副科级干部；

余 晖，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曲靖市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国家一级编剧，首届珠源文化名家。

刺绣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之一，少数民族刺绣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曲靖的少数民族传统刺绣主要集中在彝族、壮族、苗族，受现代机绣的冲击，传统手工刺绣正在淡出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传统刺绣民族工艺正在消失，为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曲靖市民宗委通过扶持示范户、培训绣娘等文化项目的建设，引导、鼓励、支持民族文化企业、刺绣小组、刺绣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探索曲靖少数民族传统刺绣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创新传统手工艺刺绣的载体，推动民族刺绣产业的发展，充分依托带动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和稳定增收的独特优势，带动贫困人口参与学习传统技艺，激发内生动力，有效促进就业，持续增加收入，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增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文化富民效果凸显，发挥了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增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少数民族妇女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二）聚焦民族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效果显著

曲靖市民宗委高度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工作，为充实民族文化工作的研究力量，曲靖市民宗委整合各方力量，积极支持成立民族文化社团组织和文化研究会，招贤纳士，对曲靖市民族文化典籍进行整理与出版，对地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依托曲靖市彝族学会开展彝族文化保护工作，完成彝文古籍的普查、征集和编纂等工作，出版发行《云南曲靖彝文古籍提要》；引导各县（市、区）对辖区内的世居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普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先后收集整理并出版了《玄通大书》《师宗壮族》等七个世居少数民族系列文化书籍。

（三）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推动曲靖市民族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曲靖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加大资金投入，并加强和完善对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人们正常的文化活动的需要。曲靖市民宗委根据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建设少数民族文化

精品工程，通过加强相关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少数民族的基本文化需求，推动了相关文化基地的建设。同时，实施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工程，在曲靖师范学院以及曲靖市各地区建立10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1个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传承推广基地。截至2020年，曲靖市先后举办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五届少数民族歌舞乐展演活动，丰富了曲靖市各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展示了曲靖各民族群众的精神面貌，增强了人们对曲靖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曲靖市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四）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得到保护与发展

为摸清曲靖市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家底，2017年开展了普查工作。通过调查，全市7个世居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共梳理出15个类别、657项传统文化资源，以此为基础，逐年申报项目、争取资金，持续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工作，使当地的各民族文化获得保护与发展的机遇，促进各民族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十年来，曲靖市共实施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项目88项、扶持资金1001万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抢救保护项目对全市7个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均有反映，涉及民族古籍、民族音乐舞蹈、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工艺美术、民族节日节庆等方面，部分项目填补了民族文化建设工作史上的一项空白，如市级实施的项目《曲靖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我们的节日》，以影像档案的形式，完整记录其原有面貌，让这些文化不会随着传承人的断代、文化的消失而消亡。“百名人才”培养项目积极发挥扶持人才的传承作用，逐步引导他们走上市场化发展道路，更好地传承保护民族文化，扶持水族郎万平吞口雕刻和苗族韩尚云芦笙演奏技艺，通过项目实施成立了水族吞口技艺传习馆，带徒授艺，开发文创产品。省级精品工程项目涉及民族音乐舞蹈、民族体育、民族饮食、民族历史等方面，多数精品项目通过与高校的合作，有效促进了民族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也增进了在校

大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了解，对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解，更加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民族文化内核丢失，传承效果不佳

由于民族文化遗产与保护体制机制不健全，曲靖市部分民族文化的传承效果不佳，出现流于形式的情况，其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特色不鲜明，民族文化内核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丢失，民族文化遗产活动进校园未实现预期目的，缺乏民族文化艺术人才的培育机制。一是民族文化建筑缺乏原有的文化内涵。二是曲靖市民族文化遗产活动进校园未达到预期目的，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流于形式。三是缺乏文化传承人，民族文化艺术人才的培育机制不健全。

（二）以静态保护为主，产业的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

曲靖市拥有较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在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之间不断融合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实现各民族群众全面脱贫，地方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已有的资源，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中，民族文化的潜在经济价值并未充分发挥，主要表现在以静态保护为主，民族文化“被关在”陈列室、博物馆，文化的活态保护缺乏应有社会环境，文化产品开发缓慢，产业附加值低。民族文化建设出现“就文化发展文化”的现象。整体来说，曲靖市民族文化产品尚未真正进入文化市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基本处于参加比赛、节会表演、应邀演出的境况，真正转化为文化产品的很少，市场认可的产品就更少；民族文化建设零散，民族文化产业才开始起步，文化品牌尚未形成。文化与农业、科技和旅游业的融合还需要进一步融合发展。例如：罗平县是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旅游业相对发达，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客源市场，但在许多人眼中看来，罗平的旅游仅是“一枝花”，是早春的赏花佳地，当地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没能有效与旅游融合发展。民族文化资源与其他

行业之间的融合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富民任重道远。

（三）文化传承意识不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消亡趋势凸显

曲靖市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多数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认识存在一定的不足与局限，没有很好的处理学习汉语与科学保护本民族语言的关系，“母语”消失严重，大部分民族青年已经只会使用汉语，不会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代际间的语言传递上，有的甚至就直接放弃传授本民族语言给下一代。由于文化主体传承主观意识的淡漠，在无意识中给民族文化的有效传递带来了危机。一些复杂的民族风俗、音乐舞蹈和生活习惯逐渐被人舍弃，相关的手工艺品的制作也逐渐被人们所放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消亡趋势凸显，如何科学有效传承、挖掘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手工技艺亟待研究。

四、意见及建议

（一）加强民族团结意识的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团结统一是其精神的表现之一。曲靖市民族文化建设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为基础，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团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各民族群众民族团结意识的培育需要通过各民族加强交流交融，树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弘扬，将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的培育。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认识，为各民族群众的民族团结意识的培育创造文化条件。例如：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习俗、文学作品以及民族信仰中都存在风雨同舟、同甘共苦、齐心协力等优秀传统思想道德，这些思想无一不表现出人们团结起来，与困

难作斗争，共同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因此，需要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内容进行挖掘和发展，并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来，各民族之间平等与友好相处，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民族的精神力量，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不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坚定文化自信，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

党和政府是我国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发挥党和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重视文化建设，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对曲靖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和对各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干部要进一步树立和增强民族文化自觉自信，把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谋划研究，增强做好新时期民族文化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教育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认同，形成高度自觉的文化自信，汇聚民族凝聚力，自觉传承和保护好民族文化；加强领导、整合力量，将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由民族和文化部门单打独奏转变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族和文化工作部门牵头抓总、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正确把握民族文化建设的内涵和本质。文化建设要因地制宜，以本地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深刻领会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结合实际情况，实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实现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三）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曲靖市拥有众多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历史遗迹，充分挖掘民族文化资源，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推进民族文化资源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发挥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助力乡村振兴。一是坚持民族

传统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开展民族传统节会和民俗活动，在发展中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坚持原汁原味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开发一批特色民族服饰、饮食和工艺品等，赋予其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有效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双赢发展；曲靖市的旅游业具有季节性，罗平春季的“油菜花节”，师宗五龙的“三月三”等，是曲靖市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一个短板。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不失为补齐这一短板的有效路径。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旅游业的发展双赢，增强本地区各民族群众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二是进行文化创作，繁荣文化市场，发展各民族群众需要的文化作品。将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发展文化创意产品，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需求，达到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做到文化建设乐民，实现文化育民，提高各民族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助力乡村振兴。

（四）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人才队伍建设。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开发，涉及门类多，历史跨度长、专业性强，不同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和表现形式，需要选择专业人才去记录整理，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因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培养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人才队伍。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乡村学校的示范教育作用，把民族乡镇的中小学校建设成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二是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阵地建设。三是有组织地开展民族文化的研讨、展演、宣传、交流合作等活动平台，增进交流，扩大影响；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其中，特别是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加入其中，从而形成具有专业性、务实性、科学性的文化建设工作队伍。社科

责任编辑：韩 瑞

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的实践与探索

——以曲靖市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为例

■ 杨洪春

一、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的概念和特点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科学、民主立法的重要性，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法法修改后赋予设区的市有立法权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提高立法质量，已经成为我们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地方立法工作的重点和首要任务，提高立法质量不仅成为地方立法机关和立法工作者的共识，同时，也是新时代立法工作的重要原则要求。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适用和生效”。立法质量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其适用情况，看其是否经得住实践的考验，实现预期的目的。这就需要对法规在立法过程中的审议环节进行分析评价和检验，以此确证地方性法规的自身价值。为此，在地方立法实践活动中地方

性法规立法中评估制度应运而生了。

在立法实践中，立法评估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由特定的评估主体，对地方性法规实现其宗旨、目标的一种评价分析。按照立法进程，立法评估可以分为立法前评估、立法中评估和立法后评估。立法前评估，也称立项评估，它是指为了使编制的立法规划和计划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列入立法规划计划的项目应当经过评估，对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作出评估。立法后评估，也称“立法后头看”，是指在法律、法规颁布实施一段时间后，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文本质量、立法价值、实施绩效、制度设计等进行客观的调查和分析，提出明确的评估结论，目的在于更好的实施、修改完善被评估的法律、法规，并从中总结经验，为开展相关立法提供借鉴和指导。这里笔者结合曲靖市地方立法实践，重点讨论立法中评估。立法中评估是指对地方性法规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通过之前进行评估，主要对即将出台的地方性法规的主要制度设计及相关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规范性进行评估，为提高

作者简介：杨洪春，曲靖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级调研员、云南省立法研究会理事。

地方立法质量加上一道“阀门”。这是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采取的一项新举措。

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具有评估对象的特定性和客观性的特点。特定性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地方法规案后，经地方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后，在第二次审议形成表决稿之前，地方人大法制委员会在履行统一审议职能的同时，委托第三方对这个法规草案文本的主要制度及其内容进行评估，为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提供借鉴和参考。客观性是指法规草案提交第三方进行评估，对法规草案的主要制度和内容上存在缺陷的地方进行分析评估，使评审结果更客观公正、科学合理。

二、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的实践与探索

根据立法法的授权和云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曲靖市自2016年3月1日起开始行使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以来，按照全国人大和省人大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紧紧围绕曲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及时启动、稳步推进地方立法工作，不断健全地方立法工作机制，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实现了地方立法工作的良好发展。四年多来，曲靖市的地方立法工作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立法需求，共制定了五件地方性法规，即：《曲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曲靖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条例》《曲靖市会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一件程序性法规和四件实体性法规，内容涵盖了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保护三个领域，立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依法规范地方立法工作程序，促进了地方治理方式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2019年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委托曲靖市地方立法

研究基地对《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开展立法中评估，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主要制度及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规范性进行立法中评估。下面将以立法中评估的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方法和评估实效为切入点，以《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评估主体：立法中评估主体，是指在立法中评估过程中，组织和承担立法中评估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评估主体的选择，对立法后评估的质量和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进行立法中评估时，我们主要是委托曲靖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开展评估工作。曲靖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是2018年市人大常委会为了进一步加强曲靖市地方立法工作，促进地方立法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更好地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人才优势和平台优势，为曲靖地方立法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咨询服务，与曲靖师范学院联合成立的搭建地方立法智库平台，这是我市地方立法工作与曲靖师范学院在地方法学研究实现深度融合，在地方立法机制上保障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一次积极探索。

（二）评估内容：立法中评估内容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可操作性进行评估。

1.合法性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评估。具体评估内容与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不越权评估，是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是

否存在超越法定职权、法律权限的情况进行评估。

《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依据《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评估；《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依据《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评估。二是不抵触评估，是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是否存在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等相抵触的情况进行评估。

《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涉及到《慈善法》《志愿者服务条例》《献血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主要涉及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等部门规章。

三是不限制权利与增设义务评估，是指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是否存在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情形进行评估。四是符合程序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制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进行评估，主要依据《立法法》和曲靖市地方立法条例进行评估。五是不矛盾，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是否与上位法相矛盾的情况进行评估。

2.合理性评估是指是否符合实际和市情，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法规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必要性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必要性以及立法理由是否充分进行评估。二是适应性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规定是否符合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文明行为促进和水源地保护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

三是针对性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是否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或者针对性，是否基本做到“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进行评估。四是职权职责、权利义务配置合理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职权职责、权利义务配置是否基本做到科学、平衡，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是否基本做到对等。五是内部协调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条文是否相互协调，各项制度是否相互衔接进行评估。六是公平正义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是否存在部门利益法制化或者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进行评估。

3.规范性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语言是否规范，结构是否规范进行评估。

4.可操作性评估是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条文是否明确，部门职责是否明确，权利救济机制及追责机制是否明确进行评估。

（三）评估方法：立法中评估方法是指曲靖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在对确定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进行立法中评估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评估采用条文精确检索、理论分析、条文对比及整体评价等方法，评估依据是与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有关的所有上位法，评估包括具体条文评估与整体规范评估。评估对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中涉及到的部分条文与上位法相抵触、存在限制公民权利、与实际不符、权利义务配置不合理、规定不明确、追责机制不明确、未规定权利救济机制、结构不规范、概念的逻辑关系混乱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必须、可以修改的建议。

（四）评估成效：立法中评估成效是指对所确定的两件地方性法规进行立法中评估后所得出的结论。评估成效一方面是法制委员会在统一审议中发现法规（草案）存在缺陷的有效途径；另一方

面，也是法制委员会在统一审议中转变立法观念、提高立法水平的重要方式。同时，评估成效为地方性法规（修改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参考。“评估工作实践表明，评估本身不是目的，而在于对立法后评估成果的应用，或者说是对评估成果价值的实际检验，即如何对症下药”。通过对两件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评估后形成的对《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立法中评估报告显示，对条例草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评估，虽然存在部分问题，但对条例草案具体规定的立法质量给予了肯定，报告还以可操作性与规范性上进行整体立法质量评估，并基于存在的问题和评估理由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

《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立法中评估量化指标体系如表一所示：

《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立法中评估量化指标体系如表二所示：

三、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制度的思考和建构

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对提高立法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作为一项创新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统一规范可以借鉴，我市首次开展的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工作，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地方性法规涉及的社会关系，哪些因素可以构成评估标准和指标以及各种标准、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权重难以科学、准确地界定；评估信息较为缺乏，立法中评估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评估主体获取信息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优劣，由于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渠道，信息获取上还具有片面性和偶然性，一定程度上影响立法效果的评估质量。因此，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这项工作还需要在

评估工作机制、评估力量充实、评估成效采信等方面不断加以完善和创新，构建常态化的运作机制，探索立法中评估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推动建立科学、规范的立法中评估体系。

（一）建立立法中评估工作的长效机制。建立立法中评估长效机制对进一步推动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立法中评估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对地方性法规（草案）整体作出评价，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提供服务。“立法效果评估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促进立法观念的转变，培养立法者的质量意识”。立法中评估在我市地方立法实践中才刚刚开始，尚没有建立成熟的体制机制和规范体系，目前，立法中评估的机制建设、评估主体、评估模式等问题都处于探索阶段。根据曲靖市人大常委会与曲靖师范学院签订的曲靖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合作协议，曲靖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机构设在曲靖师范学院，日常工作由曲靖师范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具体承担，主要从事地方立法研究、评估、咨询服务等工作。常规性的主要职责有三项：即对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对政府规章和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提出意见建议；对地方立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立法中评估活动中，地方立法工作机构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按照年度立法计划，对评估对象的选择、评估标准的确定到评估活动的具体开展以及评估报告的形成，使各个流程之间保持有效的联系沟通，尤其突出前期立法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中重点提出的问题进行评估，更好地突出评估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立法评估成果的转化，提高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为建立常态化的评估工作机制积

表一：《曲靖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立法中评估简表

指标体系		涉及条文	评估理由
一、合法性（一级指标）			具体如下
二级 指标	不抵触	11/12/20/30/32/37	法规极个别条文内容与上位法的精神、基本原则、具体规则相抵触
	不越权	无	法规内容不超越地方立法权限
	不矛盾	无	法规内容不与同位法相冲突
	合程序	无	法规的制定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不限制权利与增设义务	16	个别条文限制了公民权利
二、合理性（一级指标）			具体如下
二级 指标	必要性	无	立法必要性强，立法理由充分
	适应性	2/3/4/10/14/15/17/18/20/21	法规部分条文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条文内容不全面不规范
	针对性	15/23	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或者针对性，基本做到“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次问题”
	职权职责、权利义务配置合理	8/34/38	职权职责、权利义务配置基本做到科学、平衡，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基本做到对等
	内部协调	1	法规条文相互协调，各项制度相互衔接
	公平正义	无	法规不存部门利益法制化或者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三、操作性（一级指标）			具体如下
二级 指标	部门职责明确	6/9	法规实施部门与其他部门划分个别地方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
	条文规定明确	7/35	法规部分内容不明确，程序时限不清楚，操作方法不具体
	权利救济明确	无	权利救济渠道不够充分，权利救济机制不够明确、具体
	追责机制明确	39	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不完全对应，不够明确
四、规范性（一级指标）			具体如下
二级 指标	名称规范	无	法规名称规范、简明
	结构规范	无	法规体例结构不合理，逻辑关系不清楚
	语言规范	1/6/7/9/14	法规语言表达基本准确、严谨、简明、统一、没有歧义
	其他规范	无	标点符号和数字表达等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立法技术规范

表二：《曲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立法中评估简表

指标体系		涉及条文	评估理由
一、合法性（一级指标）			具体如下
二级 指标	不抵触	2/3/4/6/9/10/14/ 15/17/18/24/25/26/ 28/29/30/31/32/33/34	法规极个别条文内容与上位法的精神、基本原则、具体规则相抵触
	不越权	无	法规内容不超越地方立法权限
	不矛盾	无	法规内容不与同位法相冲突
	合程序	无	法规的制定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不限制权利与增设义务	29/30	个别条文限制了公民权利
二、合理性（一级指标）			具体如下
二级 指标	必要性	无	立法必要性强，立法理由充分
	适应性	5/18/19/20	法规部分条文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条文内容不全面不规范
	针对性	《条例（草案）》	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或者针对性，基本做到“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次问题”
	职权职责、权利义务配置合理	无	职权职责、权利义务配置基本做到科学、平衡，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基本做到对等
	内部协调	1/2	法规条文相互协调，各项制度相互衔接
	公平正义	无	法规不存在部门利益法制化或者地方保护倾向
三、操作性（一级指标）			具体如下
二级 指标	部门职责明确	无	法规实施部门与其他部门职权划分，个别地方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
	条文规定明确	7/8/10/11	法规部分内容不明确，程序时限不清楚，操作方法不具体
	权利救济明确	需补充	权利救济渠道不够充分，权利救济机制不够明确、具体
	追责机制明确	无	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不完全对应，不够明确
四、规范性（一级指标）			具体如下
二级 指标	名称规范	无	法规名称规范、简明
	结构规范	无	法规体例结构不合理，逻辑关系不清楚
	语言规范	6/12	法规语言表达基本准确、严谨、简明、统一，没有歧义
	其他规范	无	标点符号和数字表达等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立法技术规范

累经验。

（二）充实和加强立法中评估主体的力量。

曲靖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作为地方立法中的评估主体，配备专职或兼职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分为常年研究员和课题研究员，聘请4名常年研究员，课题研究员由立法研究基地根据评估课题需要聘请。在按照合作协议履行职责中，需要组织好立法研究人员，优化整合法学研究与实践工作力量，结合所承担的立法工作任务，为地方立法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研究服务；用好专业力量推进精细化立法，提高地方立法评估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借助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实践平台作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了解地方立法，积极参与到地方立法中来。与此同时，地方立法工作机构要根据地方立法工作的需要，切实履行协调职责，在评估活动中让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立法研究人员熟悉地方性法规（草案）所涉及的实际情况，全方位参与到立法工作中来，为开展立法评估和研究提供必要保障。

（三）切实增强立法中评估结论的有效性。

对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仍存在重视评估的过程，对评估结论中提出的意见采信重视不够，对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成果的转化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对立法中评估结论最后提出的“修改建议稿”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等问题，其主要原因还是对某一具体问题在思想认识上不统一，最终没有达成协调一致的意见。立法中评估的目的在于对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规范性进行论证。为了避免立法中评估成为一种“表面上的评估”，必须注重评估结果的处理与转化，积极争取落实评估报告提出的建议，使其为提高立法实效服务，使立法中评估真正成为促

进地方性法规立法质量不断完善的纽带与桥梁。因此，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要切实增强立法中评估结论的说理性，评估结论报告必须建立在科学、客观论证的基础上，要体现充分的论证和翔实的依据，增强立法中评估结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在社会现实中，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够一劳永逸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为增强法规的适应性，地方立法机构应随时关注社会实际并予以回应。因此，必须将立法中评估与立法前评估、立法后评估工作统一于动态变化的地方立法实践活动中，建立和完善地方性法规立、改、废、释工作机制，以维护法制统一，在“质量型”的立法时代，总结和完善的立法中评估制度，注重地方立法质量的提升。

四、结语

当前，地方立法已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迈进，良法善治要求地方立法更趋于精细化，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立法中评估是实践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如何使地方立法中评估真正发挥作用，关键还是在于立法中评估工作的质量以及评估成效的采用与转化。我市地方立法机构通过一年多来的实践探索，立法中评估对于促进地方性法规的不断完善，提升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下一步，地方立法工作要不断总结和探索现有成功经验和可行的做法，推动地方性法规立法中评估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为地方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

注：科

责任编辑：邱俊翔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保障全面实现小康

■ 许 霁 张 伦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曲靖市立足实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市有机统一，不断探索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方法和路径，加快推进民主法治化进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主法治”监测指标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的“民主法治（制）”指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

2008年，“民主法制”指标首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中。2013年，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2013年

版），将“民主法制”指标增加为“基层民主参选率”“每万名公务人员检察机关立案人数”“社会安全指数”“每万人拥有律师数”4项指标，权重为14。2016年，《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2016年版）》用“民主法治”替代“民主法制”，用“基层民主参选率”“每万人拥有律师数”“每万人行政诉讼发案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4项指标替代原指标，同时将权重调整为12，详见表1。

从“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一是“民主法制”指标的从无到有，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小康社会”认识的发展脉络。20世纪80年代，“小康”一词由时任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口为人民所知悉，当时的“小康

表1 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民主法治（制）”指标明细（2008年—2016年）

2008年		2013年		2016年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民主法制	11	民主法制	14	民主法治	12
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	5	基层民主参选率	3.5	基层民主参选率	3.0
社会安全指数	6	社会安全指数	4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	3.0
		每万名公务人员检察机关立案人数	3.5	每万人行政诉讼发案率	3.0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3.0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3.0

作者简介：许霁，中共曲靖市委党校干部继续教育处处长；
张伦，曲靖市司法局副局长，市委依法治市办副主任。

社会”目标着重强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故而，1991年，在国家统计局首次提出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建议中，并没有“民主法治”指标。其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各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新高度，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起点，更加重视充分发挥法治在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全面依法治国提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高度，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

二是监测指标从“法制”到“法治”，从单一监测指标到复合监测指标，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完善到逐步成熟的历程。从字面含义上看，“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范畴，重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项具体的法律制度；“法治”则是以民主为基础、以依法治国为核心、以约束权力为关键的一种社会治理机制，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表明党和人民对法治认识的深化：从强调制度构建的“法制”，到强调通过法律达到善治的“法治”。

三是从四十年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看，目前“民主法治”方面现有的监测指标还是显得较为单一和片面，无法准确反映十八大以来民主法治建设成效的全貌。例如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的加强与改

善、法治政府建设、司法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等工作，直接从指标中看不到建设成效。故而有必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小康指标”体系。

二、曲靖市“民主法治”建设指标进度评价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提供给各地参照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中的“民主法治”指标进行评估，从2015年至2019年，曲靖全市民主法治程度有所提升，尤其2016年比2015年显著提高，但随后缓慢提升，2019年还略有下降，实现度仅为67.17%，仅仅达到“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还存在着不小差距（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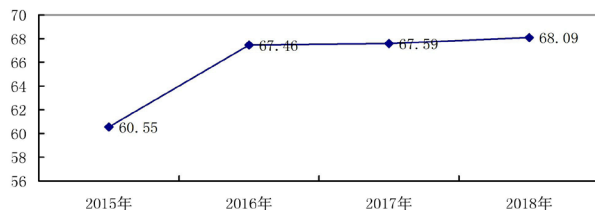


图1 曲靖市民主法治指数测算分值
(2015年—2019年)

1. “基层民主参与率”接近全面完成

“基层民主参与率”是“民主法治”中的核心指标，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中均对“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2013年和2016年，曲靖市先后完成两届村（社区）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2013年，基层民主参选率为90.58%，2016年提升至91.25%，增长了0.67个百分点。2016年基层民主参选率的测评分值为99.18分，达到“全面小康”标准（详见表2）。

2. “妇女参与民主管理指数”实现程度较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妇女参与民主管理”是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女性的基层民主管理参与程度反映了“基层民主建设”的成绩。曲靖市2016年居民委员会中女性比重为25.2%，村民委员会中女性比重为19%，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值比较，分别低了24.3和11个百分点，与“全面小康”存在较大差距。（详见表2）

表2 曲靖市基层民主参选率、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率及测评分值（2013年—2016年）

指标	2013年	2016年
基层民主参选率	90.58%	91.25
基层民主参选率测评分值	98.46	99.18
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率	13.68%	25.2%
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率测评分值	36.48	56.78

但是如果纵向比较的话，可以看到：曲靖市妇女的参政议政程度在不断提高。2016年，全市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后，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19%，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25.2%，比2013年实现了大幅增长。（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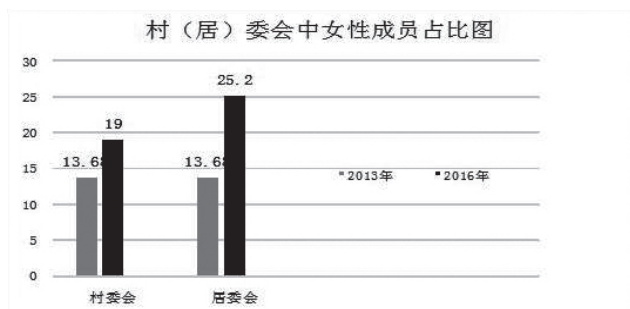


图2 曲靖市村（居）委会成员中女性占比情况（2013年—2016年）

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18）》的统计，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会有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中有女委员440人，占委员总数的20.4%。与全国的数据相比，曲靖市第五届人民代表会有女代表163名，占代表总数的34.03%，曲靖市政协第五

届委员会共有委员440人，女委员164人，占委员总数的37.28% [数据来源由政协曲靖市委员会提供。]，二者比率均高于全国。且从2013年至2018年，全市妇女干部的总数以及妇女干部占比也在逐年增加，2018年全市妇女干部6108人，占比达26.68%。（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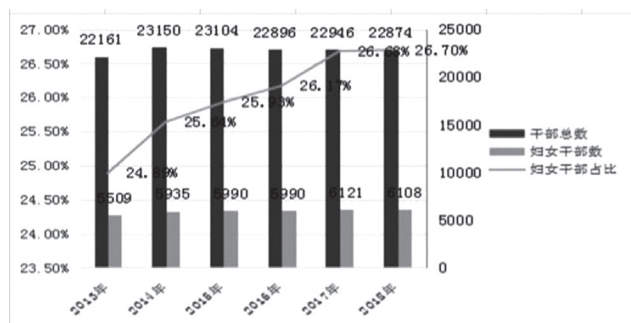


图3 曲靖市妇女干部总数及占比图

3.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逐年下降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监测指标主要是反映社会治理水平。曲靖市2018年共有社会组织1932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3.14个，测评分值为48.29，与全面小康差距较大。曲靖的社会组织数仅占全省社会组织注册登记数的10%。如果按照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6.5个指标监测，2019年、2020年还需要培育2085个社会组织单位，任务艰巨。值得注意的是，从2013年以后，党和国家加大了对社会组织清理的力度，社会组织的设立和管理愈加规范，一些不合法不合规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社会组织自然消亡或撤销。从而导致全市社会组织数量从2016年开始，呈逐年下降趋势。（详见表3）

表3 曲靖市社会组织基本情况（2015年—2018年）

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全市社会组织总数	2063个	2188个	2045个	1932个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	3.41个	3.40个	3.34个	3.14个
测评分值	52.49	55.33	51.39	48.29

4.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可以实现

律师是法律秩序的建构者之一，是民主法治

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律师也是较早市场化的职业之一，因此，律师职业的发展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二者成正比关系。曲靖2018年共有专兼职律师723名，每万人拥有律师人数1.17人，分值为68.03，达到“总体小康”水平，与“全面小康”还存在差距，但经努力后基本可以实现。（详见表4）

表4 曲靖市律师人数基本情况（2015年—2018年）

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全市律师数	490人	566人	644人	723人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0.81人	0.93人	1.05人	1.17人
测评分值	54.79	58.46	62.92	68.03

2019年曲靖市有律师794名，每万人实际拥有律师数只有1.28人。需要注意的是，曲靖市的律师行业近年来呈逐年大幅增长趋势：从2015年至2019年，全市律师事务所从65所增长至86所，增长率为32.3%，律师人数从490人增长至794人，增长率达62.04%。（详见表5）

表5 全市2015年—2019年律师业发展情况

年份	律师事务所（个）	律师（人）
2015年	65	490
2016年	74	566
2017年	80	644
2018年	83	723
2019年	86	794

三、结合实际，确定全面小康“民主法治”曲靖指标

曲靖市的民主法治建设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但因为使用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提供给各地参照的“全国体系”进行测算，没能体现曲靖实践特色，客观造成了“民主法治”指标评测分值偏低、与“全面小康”差距大的情况。也正是因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功能定位都存在差异，国家统计局

从2016年开始就不再用统一的小康监测体系来对各地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进行监测，而是提倡各地因地制宜，结合各地的实际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定监测指标体系和确定2020年的目标值。例如福建、广东、江西、内蒙等省（市、自治区），早在2015年就提出了“构建符合本地实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还有部分省把小康监测指标体系的标准设定权扩展到市县一级，如宁夏、湖南、江西等。因此，建议曲靖市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探索适用自身实际的指标体系。

（一）适度调低“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指数”的比例要求

“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指数”是通过村（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合成得出，计算公式为：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指数=（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50+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30）/2。通过公式可以看出，该指标设定的标准是：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要占到50%，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要占到30%。这样的标准与曲靖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建议进行调整。

2016年，在云南省村（居）民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换届选举中，《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村（社区）党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云办发〔2016〕11号）中，对村（居）委会女性比例要求：“力争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30%以上，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50%以上。”但是基于云南经济落后、外出打工人员多，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该文件又做了变通规定：“原则上要有1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和1名女性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采取优先提名确定妇女候选人、妇女成员专职专选等措施，确保村妇代会主任、社区妇联主席100%进村（社区）‘两委’班子”。曲靖市在2016年基层自治组织的换届

表6 曲靖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民主法治”指标建议明细

序号	测评指标	权重	计量单位	目标值	说明
1	基层民主参选率	2	%	≥92	不变
2	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指数	2	%	≥100	计算公式修改为：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指数=（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25+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20）/2
3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	2	个	≥6.5	不变
4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和其他法律服务工作者数	2	人	≥2.5	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公证员”纳入计算范围

工作中，对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中就按照“最低要有1名女性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的标准进行了严格执行。

按照村（居）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1名女性的要求，村委会成员3—7名，女性比例应在14%—33%之间；居委会成员5—9名，女性比例应在11%—20%之间。目前曲靖市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19%，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25.2%，已经超出了2016年换届时文件要求的最低要求。故建议根据曲靖的实际情况，取折中标准，将指标计算的标准调整为“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要占到25%，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要占到20%”。计算公式相应改为：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指数=（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25+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20）/2。

（二）适度扩大“每万人拥有律师数”的计算范围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是指“平均每万人口中拥有律师工作人员的数量”，计算公式为：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律师（人）/年末常住人口数（万人）。2019年末，曲靖有律师794名，每万人拥有律师1.28人，未达到国家指标体系中要求的2.3人。建议根据曲靖的实际情况，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公证员”纳入计算范围。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完善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队伍”，把扩大基础法律服务队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司法部在2017年修订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137号）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138号），重在解决基层和不发达地区法律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律师资源相对匮乏，基层法律服务仍将在一定时期发挥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特别是在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工作力量[数据来源由曲靖市委组织部提供。]”。根据曲靖的实际，建议将计算的范围扩大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同样，公证员队伍也是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专业队伍之一。随着经济发展，公证需求日益增多。2016年至2019年，全市10家公证机构拥有执业公证员54人，一共办理了国内公证92368件，涉外公证6809件，涉港澳台公证212件。公证工作站在“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的最前沿”，其作用已经日益得到群众的公认。为体现对法律公共服务发展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建议将全市的公证员人数纳入计算范围。（具体修改重点参见表6。）社科

责任编辑：邱俊翔

马龙汉族溯源

■ 杨增外

走遍云南，只要是汉族村寨，村民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祖辈父辈告诉我们，祖先是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

走访马龙汉族村，只要问老人我们最早从哪里来？十有八九都会说：“从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搬来的”；但凡翻开家谱，上面均记载着先祖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如纳章镇纳章村600多户人家，仅杨姓180余户，可杨姓是三个家族，他们是从马龙区外三个不同的地方先后搬迁到纳章村的，而家谱基本所述祖先都是从“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而来。月望乡下营村委会三间屋村范姓家族，祖碑所刻“明代从苏省来”，问苏省什么地方，回答也是南京。然而，大多家族什么年月到马龙？具体怎么来？基本说不清，道不明。

云南汉族自发到南京查访频繁，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专家们查阅史料，得知古南京柳树湾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它地处大阳沟（今位于南京市秦淮大光路）河弯处，那时有许多柳树。经实地踏勘访问，在明故宫的遗址上找到一块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初九立的大石碑，碑文曰：

“看得疏通沟渠，乃王政要务。除十三门内大小渠陆续疏通外，惟洪武冈口（以）东，从口口关首下北东城兵马司门首下北标营，柳树湾、关王庙，太医院等处过西下各沟，向来不得下流之处，所以虽经疏浚，水仍不。”

接着，专家又查对《明宫城图第十》，看到图面标有“东城兵马司”“太医院”。将碑文与宫

城图一对照，这说明柳树湾的地名明代确实存在，位置原即东城兵马司与太医院之间，正与现在的石门坎相去不远（筑城后由城墙隔开）。至此明白，“高石坎”应为今“石门坎”，柳树湾即在今天的城东南角，当年太医院的上游，东城兵马司的下方，即今天南京市的蓝旗街、御道街一带。

柳树湾、高石坎的名字虽然随历史进程而消失了，但云南汉族的乡愁至今挥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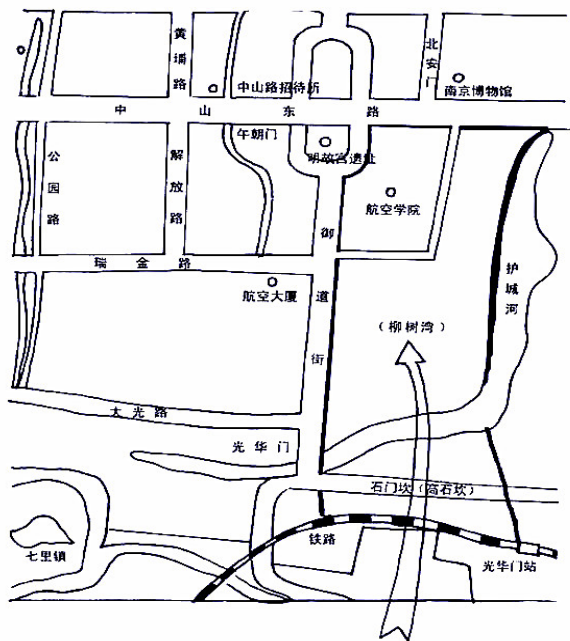
战争引起多次人口迁移

春秋战国前，云南无汉族，所以，司马迁称此地为西南夷地区。庄蹻王滇，云南才添入了汉族。汉武帝征服了云南，“募豪民田南夷”，首开汉族移民云南。后续有汉迁，但汉族人数占比较少，变服从俗而融，至三国两晋，云南仍是夷汉合流。南诏与唐朝先合后战，唐娄败，数万汉族军民被俘或被虏入云南。



柳树湾石刻

作者简介：杨增外，中共马龙区委农办，区农业农村局。



柳树湾 高石坎位置图

调北征南成规模

汉族大量移入云南开始于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绝大多数部分是以军屯形式迁人。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调派其正在北方与北元作战的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将领挥师云南。洪武十五年（1382年）闰二月，占领了云南，结束了元梁王和大理段氏对云南的统治。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傅友德、蓝玉奉诏班师回朝，沐英及数十万明朝官兵留下驻守云南。据《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说：“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云武、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又奏请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并请发库架三百万两。帝均允之”。还说沐英守滇期间总共“移民至四百余万”，其子沐春也曾“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滇。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患反侧，尽迁其民于云南。”《滇

粹》还载：“春（沐春，沐英长子）镇滇，春七年（公元1392~1398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

明代创立的卫所制在云南创造性的实施，普遍实行军屯、民屯、商屯。卫所屯田制规定：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军士应起解者皆金妻”，实际上军士之妻既有从原籍带来的，也有在驻防地区新找到的。为安抚云南驻军，洪武二十九年冬，朝廷“赐云南左、右、前三卫并楚雄、大理、临安、曲靖四卫军士三万五千人钞凡七万锭”。

按当时云南军屯以十九卫、十八个千户所计，应有十二万六千多军户，大约六十三万人口。民屯、商屯人口与军屯人口相近，两者合计一百二十万人。

有学者计算：明初10年间全国人口约七千万，云南土著人口不到30万。1/65人口移往云南，内地移民应占云南总人口的一半多，逐步改变了汉人夷化的现象。

受命迁移

马龙的土著民族是彝族，马龙彝族有“老家”之说，这是大家认可的。马龙汉族怎么来的？应该说，主要是朝廷多次征南，汉族逐步移滇的大背景下迁移而来。

庄跻入滇，汉代征南，移居马龙的汉族因马龙



洪武征南



庄蹻入滇

现存史料难以查找，碑刻极少，家谱虽有但述而不细，口传普遍但依据不明。

然而，马龙是中原入滇的必经之地，且古驿道穿越马龙地界里程较长，无论战争还是经商，马龙不会只发挥纯粹承载过客的作用。爨代统治近五百年，东爨中心在曲靖、马龙、陆良，爨代是汉夷共融的时代，马龙曾是战争的中心地之一，马龙应有一定人口的汉族成分，只不过“变服从其俗”，成为夷化了的汉族。南诏时期战乱不断，马龙也没有置身其外。南诏曾打到长安，所俘虏的中原兵丁和掠抢的汉民不可能不放在马龙。

元代马龙设州以来，云南越来越被外界看好，长久掌控云南成为多个朝代统治者的目标。争夺战争频繁，封闭的马龙逐步开放，军屯、民屯、商屯纷至沓来。直至今日，马龙汉族村名中，带铺、堡、营、哨、所、屯、田、关的不胜枚举，再加之古传“汉来彝让”的说法，佐证了元明时期，马龙汉族人口逐步大量增长。《雍正马龙州志》卷3《地理·乡屯》记载：马龙州“州境四乡一所，乡皆民村，汉夷杂处，西北汉夷乃汉多夷少，东南则汉少夷多，所中皆军屯也。”

现在，马龙汉族几乎说祖籍是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可不少资料却说：洪武征南，多数军人祖籍山东莱州、登州、青州和苏北、淮北等地。还有沐英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等记载，虽说数字可能夸大不少，但其事件必然存在。因此有专家推断，南京是明朝初期的都城，柳树湾高石坎

可能是调集整训待伐的集中地。随军来到云南的汉兵汉民，日久时长，就把从柳树湾高石坎这一出发地，一律说成是祖籍了。所以都说祖籍是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马龙邱氏家谱记载：邱氏祖籍山东，属姜太公的后裔，明代洪武征南到云南。马龙查氏家谱说：马龙查氏祖籍“东河”，后经实地考察，“东河”即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东联乡的一条河。编纂家谱的研究过程中还有个说法，“东河”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指江浙的一条主河。查氏先祖是军人，受命到南京应天府集中。当时朱元璋以锦囊形式颁发一密旨于千总以上头领，命到云南才准许打开。到云南打开一看：旨意明确征南军人留守云南，不准再回内地，不然满门抄斩。留守马龙的是查氏的观奴公与观住公，几百年的繁衍发展，马龙查氏家族中有外迁贵州、四川的，因此马龙还是查氏家族的祖源地之一。据丫口子李氏家族族谱记载：该村李氏家族祖籍陇西成纪，后从南京应天府受命迁至大理，再至昆明。其中一支系先后迁曲靖、平彝，再到马龙色甲、马过河、双堆，最后才在禄旺定居至今，而禄旺即今天的丫口子村。

明清至民国时期，军队调防留居、内地人做生意久住；抗日年间，大学、中专、商号、工厂迁昆，不少人因婚定居云南。云南壮美的河山，多彩的民族风情，厚重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土特产及商机吸引了无数省外汉族人到云南。偏僻的马龙客观上也被影响和传播，或者也有不少人定居马龙。此时马龙汉族人口已经完全成为主体。

新中国成立后，军人就地转业，三线建设，上山下乡部分知青，内地人派往工作，不少人在马龙人成家，其后代也成了马龙人。

根据多方面的分析推断，马龙汉族人口清代以来，无论区划如何调整变动，人口数始终占据境内的主体。至1950年马龙汉族人口57886人，2019年发展至194279人，占全区总人口的91.6%，略低于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数。现全区大约400个自然村，除57个少数民族村组外，都是汉族村寨。

方言还留影

云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马龙方言里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元明清中原方言词语，还存有南京或中原方言的影子。如：

拿“舞儿wuer”来添饭（拿“碗”来添饭）。

回来吃“曼曼”啦（回来吃饭啦）。

我我舀“wuer”水“活”（我舀“碗”水“喝”）。

“各”吃掉饭了？他说“biu”（“给”吃了饭没有？他说没有）。

带他上“该”买“孩子克”（带他上“街”买“鞋子去”）。

“克”农贸市场买块“如”，记着多少“切”一斤（去农贸市场买块“肉”，记着多少“钱”一斤）。

“如”还“恩”，咬不动（“肉”还“硬”，咬不动）。

煨着水，“望着”要“涨了”（煨着水，注意“看着”，要“开了”）。

水要“浦了”（水要“开了”）。

雨太大我的“衣裳潮”了（雨太大，我的“衣服湿”了）。



滇王印

这“过”人“日浓”得很（这个人做不成事）。

那人“憨除除”的，还“死头干姜”的（那人不聪明，还不灵活）。

你不要“神头二五”（你不要癫狂）！

疤痢这个二流子“稍”得很（疤痢这个二流子“蠢”得很）。

“冒挨”我“鬼扯”（不要跟我胡乱说话）！

老板太“拿翘”（老板太“高傲”）

那个姑娘“腊草”，从不做“尔其”事（那个姑娘聪慧得体，从不做有偏差的事）。

这“小娃”很逗人喜欢（这个“小孩”很招人喜欢）。

你大“柏”身体怎样（你大“伯”身体怎样）？

我“国国”“喊”春生（我“哥哥”“叫”春生）。

今天下午上了三节“括”（今天下午上了三节“课”）。

那个山洞“嘿咕啦漆的”（那个山洞光线太暗）。

前晚我的“磕膝头”碰着了（前晚我的“膝盖”碰着了）。

“粪塘”太脏，“茅丝”太臭（“厕所”太脏太臭）。

民居仍存根

云南的“三坊一照壁”“一颗印”等式样的民居，既有一些江南民居“天人合一”的特色，也有北方四合院的一些风格。马龙纳章镇60—70年代，大营供销社、方郎供销社的房屋，大庄乡民国孙区长家老房，包括全区早年的“四合院”、“三间两耳”“半颗印”“多户并联式”等汉族老民居，都有中原汉文化建筑的底蕴，只不过为适应新域环境而有些变异。社科

责任编辑：张 兵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稿启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相继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隆重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总结回顾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曲靖社会科学》今起开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专栏，现面向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及专家学者开展论文征集活动。

一、征文要求

(一)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动员全市干部群众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涉及相关历史事件的观点结论，要符合党的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精神。

(二)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围绕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结合曲靖实践，主题鲜明、立意新颖，史论结合，注重开展学理性分析，坚持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 逻辑严谨，表述准确，文风朴实，语言流畅，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文责自负。

(四) 应征论文须为未发表的成果，并符合学术规范。论文字数控制在3000—5000字，并附2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文尾注）。

(五) 应征论文须在论文首页注明“建党100周年理论征文”字样。

(六) 作者相关信息请在论文文尾注明，包括作者姓名、单位、职务、职称、联系电话及邮箱。

(七)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

二、征文评审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组织评审专家组对论文进行评审，对获奖论文进行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同时选登在《曲靖社会科学》刊物上。

三、投稿方式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qjshkx@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活动”。

联系人：陈老师 13987490241

张老师 15974675567 0874-3124524

地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文昌街67号市委大院原曲靖宾馆三号楼2楼3211室

曲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1年4月16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一切向前看，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百年恰风华，党史的那头连着一代代革命先辈的矢志奋斗，党史的这头通向一个个蓬勃的青春梦想。每一次对党史的回望，都是一次对精神的洗礼、对初心的叩问，都是一次信仰的集结、奋斗的冲锋。

微信
微博
我们开通了
官方微信及微
博啦！直接
扫描二维码



微信

微博